

The background is a detailed painting of a harbor. On the left, a two-story wooden building with a red roof and a balcony stands on stilts over the water. A small sailboat with white sails is docked in front of it. To the right, a tall, white lighthouse with a yellow light at the top stands on a rocky outcrop. Another sailboat is visible in the distance. The water is dark with ripples, and a wooden post with a rope is in the foreground on the right.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高尔基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高尔基传

X X X 编著

目录

序言·····	001
一、童年时代·····	002
二、书缘·····	007
三、喀山的“大学”·····	011
四、真实的告白——自传体小说三部曲·····	015
五、生活的馈赠·····	022
六、走上文坛·····	026
七、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创作·····	033
八、峥嵘岁月·····	042
九、新颖的哲理剧——《底层》·····	054
十、一本及时的书——《母亲》·····	060
十一、伟大的友谊——列宁与高尔基·····	066
十二、将倾的大厦——《阿尔达莫诺 家的事业》·····	086
十三、新“雅斯纳亚·波良纳”·····	095
十四、在最后的日子里·····	108
十五、最后的杰作——《克里姆·萨 姆金的一生》·····	113

序言

“你走了，而你栽的花还留着，还在生长。我看见这些花，就愉快地想，我的好儿子走后在喀普里留下了一些好东西——花。

“如果你随时随地，在你的一生中只给人们留下好东西——花、思想和关于你的美好回忆，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轻松愉快。那时你就会感到自己是别人所需要的，这种感觉会使你的心灵丰富起来。你要知道，给予永远比取得更为愉快。”

这是一位父亲在80多年前给爱子写的一封信。这位真挚亲切的父亲，就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他的一生，正是“给人们留下好东西”的一生。他艰苦的生活历程、执着的追求精神和博大深邃的思想，使他深受世人敬仰。他创作的、作为这些历程、精神、思想之体现的许多杰出的作品，使他成为20世纪世界文坛上的一颗璀璨的星星。

一、童年时代

马克西姆·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28日，他诞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城(即今高尔基市)。

高尔基的祖父是个沙皇军官，粗暴残忍。父亲马克西姆·萨瓦季耶维奇·彼什科夫不堪忍受，外出谋生，来到下诺夫戈罗德城，在一家木器店里学木工。他结识了隔壁家的染坊老板卡希林的女儿瓦尔瓦拉，后来她成了高尔基的母亲。卡希林一直顽固地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贵族，直到小外孙出世，才承认了这个女婿。

据亲眷们说，马克西姆·萨瓦季耶维奇·彼什科夫是一个聪明、能干、善良、乐观的人。在自传体小说《童年》里，高尔基用了几页的篇幅来描写他。高尔基遗传了父亲的这些优良品性。出于对父亲的纪念，高尔基后来选择了父亲的名字(马克西姆)作为笔名。

笔名的另一部分——“高尔基”的俄文含义是“最大的痛苦”。这正是高尔基童年的真实概括。

高尔基4岁丧父，10岁失母，他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卡希林家度过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外祖父贪婪残暴，常常毒打高尔基。两个舅舅极端自私自利，时常为了争夺家产而野蛮斗殴。在卡希林家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她是小高尔基黯淡无光的儿童时代的温暖所在。她就是外祖母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在《童年》里，高尔基把她描写成为一个雍容端庄的令人难忘的形象。在这位年轻时代做过织花边女工的老人的记忆里，保存着大量丰富、生动、优美的童话故事和民间歌谣。通过“圣母娘娘”的故事、战士伊凡·阿列克赛的诗篇、英明的华西莉莎、公羊神父和上帝的教子的童话，这位禀性高贵的妇女把质朴的民间文学作品深深地渗入小高尔基的心中，培养了他对俄罗斯、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对正义事业与美好生活的憧憬。

在童年时代，还有三个人给小高尔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善良的青年学徒茨冈。每当外祖父毒打高尔基，茨冈总是挡在中间，用自己的手臂去挡鞭子，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在高尔基的舅母忌辰那天，两个舅舅叫茨冈背十字架去上坟，因为十字架太重，茨冈被压得跌倒在地，脊背断裂，流血过多而死。高尔基带着深情，把他也写进了《童年》里，称他是有一双“金不换的手”的茨冈。

另一位是老工人葛利高里。他给高尔基的外祖父

干了一辈子活，因劳累过度而双目失明，被主人赶出门外，沦为乞丐。

还有一位是外祖父的房客，绰号叫做“好事情”的科学家。他衣衫褴褛，整天埋头在书籍、酒精灯、铜块、铅条之中，最后被外祖父撵走。在《童年》里，高尔基把他称做是自己接触到的“祖国无数优秀人物中的第一个人”。这位科学家的遭遇，一直留在了高尔基的记忆里。他一生都重视科学家、作家、诗人等对文化有贡献的人。在十几年后，特别是在1918—1920年的饥荒时期里，高尔基甚至放弃了文艺创作，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尽自己所能地拯救文化人的生命上。高尔基经常写文章呼吁保护知识分子，在1920年成立的“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里，他担任主席，下设了“学者之家”、“作者之家”、“艺术家之家”，给学者、作家发一些特殊的粮食券。靠了高尔基的积极努力，科学家们才度过了难关。许多科学家后来回忆起来，都对高尔基充满了感激。1921年，高尔基在克里姆林宫同列宁见面时，谈到了应该改善科学院院士巴甫洛夫以及其他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久，就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高尔基再次担任其中的工作。

童年时接触到的人和事往往对一个人的一生有巨大的影响。父亲、外祖母、茨冈、葛利高里等都是善

良的劳动人民，然而他们最终都落得被雇主、被社会吞噬的悲剧命运。这种美好者被毁灭的残酷，冲击着幼小的高尔基的心灵。也许从那时起，在高尔基朦胧的思想里，就否决了善良者以忍耐和驯从走向幸福的幻想，这使他分外清醒，所以后来没有像托尔斯泰一样，成为一个倡导“忍耐和驯服的人”。同时，一种不平则鸣，不平则动的思想已经暗暗潜伏在他的身上了。

这时，外祖父开始破产了。高尔基在上初级小学的同时，开始了捡破烂的生涯，因而受到了同学们的耻笑。贫困招致的歧视使他憎恨学校的各种规定，也厌恶同学，但他的成绩很好。有一次，他受到了学校的奖赏，得到了一本福音书，一本克雷洛夫寓言诗，一本《法达——莫尔加那》（法国布列顿省童话中的女巫的名字），还有一张奖状。

因为贫穷，外祖母又卧病在床，高尔基把书拿到小铺子里卖了55戈比，把钱交给了外祖母。

颇值一提的倒是那张奖状，高尔基“恶作剧”地在上面题了一些字，却被一无所知的外祖父珍藏起来。

奖状的原文是：

奖状

尼·库纳文诺城郊初级小学为奖励品学兼优之学生阿列克赛·彼什科夫，特颁发此奖状，以树楷模。

1876年5月18日

小高尔基把日期改动了，在彼什科夫的姓氏上添了个绰号“巴什雷克”（这是一个强盗头目的名字），在“品学”后添上了“及淘气”，并且将下诺夫戈罗德库纳文诺城郊初级小学的名称，改成了“我们猪猡的库纳文诺初级小学”。

这张奖状의改写，大概是保存至今的、这位文坛大师最早的手书了吧。

因学贫穷，不久，高尔基就辍学了。那是1879年，他11岁，还未读完初级小学三年级。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个才念完初级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在10多年后，会成为俄国、甚至是欧洲闻名的作家。

小高尔基先是被送到了一家鞋店，接着被送到了—一个建筑绘图师家中做学徒。他除了在店棚里劳动，还得干老板家里全部的家务活儿——打扫房间、洗刷器皿、劈柴洗菜、带孩子、上市场、当跑腿儿的。活儿太多了，无论是平日还是节时，高尔基的生活中都同样排满了琐碎的、毫无意义的和毫无效果的劳动。精神的贫乏终于促使这个聪颖的孩子跑了出去，到了伏尔加河的一条叫“善良号”的轮船上。他在这儿干上了洗碗工。

二、书缘

如果说，在童年时代，高尔基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外祖母是他的幸运的话，那么，更为幸运的是，小高尔基在“善良号”上遇上了厨子史穆莱。这位曾经作过近卫军中士的史穆莱，有一个大皮箱，装着满满的书，史穆莱尽管文化水平不高，却酷爱书籍。他总是良莠不分，不加以特别选择地叫高尔基大声朗诵各种作品给他听。然而正是这种“酷爱”深深地感染了高尔基，也唤起了高尔基对于读书的强烈兴趣。自此以后，高尔基的读书欲就再也没有减退过。所以，回忆起史穆莱，高尔基称他为自己的“启蒙老师”。

1880年秋天，小高尔基被解雇了。他回到了绘图师家中，同时他也把读书的习惯带了回来。这一精神的享受却在肉体上给高尔基带来了许多的痛苦。工作量加大了，主人禁止高尔基看书。高尔基只能在一天繁重的工作结束后，偷偷地躲起来看书。绘图师的母亲是个吝啬鬼，她清数了家中所有的蜡烛头子，并丈量了长短，一旦发现短少了，揪住高尔基就是一顿痛打。高尔基只能借铜锅反射的月光看书。有一次，因为他看书太专心，烧坏了炊具，招致这吝啬鬼的一顿毒打。高尔基被送到医院后，从背上挑出了42根

木刺。也许现在的读者难以想象：蜡烛头也能成为一个人享受不到的奢侈品；更难以想象一个人为了读书可以付出那么高的代价！

这个出身贫寒然而内心十分敏感的孩子，忍受了重重磨难，在书籍中找到了他的天地。他曾多次回忆书籍带给他的美妙感觉。

他从公共图书馆里借到的第一本书是《巴黎的悲剧》。“这本书是 克萨维·德·蒙台潘 的一部长篇小说……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多得很，描绘出一种我所不熟悉的，急剧变动的生活……这本书一下子就在人的心里激发出要帮助这个人和打击那个人的强烈愿望，忘了这种出人意外地展开的生活其实纯粹是纸上的生活。斗争的激荡使人忘却了一切。人的心就淹没在读这一页的高兴心情和读那一页的悲伤心情里了……”

“罗堪博尔(法国作家彭桑·杜·特里尔 所著惊险小说中的主人公)教导我做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对环境的力量决不屈服。仲马笔下的那些人物启发我树立一种献身于某种重要而伟大的事业的志愿。”

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一书给他带来了奇迹般的印象。“葛朗台老头子使我鲜明地联想到了我的外祖父。这本书这么小，这是令人遗憾的，然而其中的真实情况又有那么多，这却使人吃惊……”

“我还记得，在三圣节那天晚间我读了福楼拜的

《一颗简单的心》。我爬到板棚上，坐在棚顶，躲避着节日里那些兴致勃勃的人们。我完全被小说惊呆了，好像成了聋子和哑巴，那些最平凡的村妇、厨娘们既没有创建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犯下什么罪行，但是对我来说，她们却胜过了春天里喧嚣的节日。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用那些我所熟悉的普通语言铺陈出的厨娘们‘无意义’的生活故事，却使我如此激动？……”

当他拿到普希金的长诗时，“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心里充满了如饥似渴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无意间来到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美丽地方，总想一下子把这整个地方都跑遍似的。也像一个人在沼泽地带的树林中，在那些长了青苔的土墩上走了很久，突然有一片干燥的，遍是鲜花和洒满了阳光的林边草地在他的眼前展开，他就会生出这样的心情。”高尔基还回忆道：“普希金那些精彩的童话诗对我来说非常亲切易懂。我只要把它们读几遍就背下来了。我躺下来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不出声地念那些诗，直到睡着为止。”

强烈的求知欲和创造性的想象力，赋予高尔基一种奇妙的判断力，他能从那些低劣质量的作品中依然发现知识的闪光点；逐步提高的鉴赏力又使他敏锐地接受着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司汤达的小说，并学习他

们卓越的现实主义。从小学生到作家，这中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少年时，高尔基与书结缘，书籍对他的成长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

高尔基曾讲过的关于“书”的许多格言，已经被千千万万的人所熟知，所传诵。例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活伴侣和导师”；“热爱书籍吧，书籍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知识才能解救人类，只有知识才能使我们变成精神上坚强的、正直的、有理性的人，唯有这种人才能真正热爱人类、新生人的劳动，衷心地赞美人类永不停息的伟大劳动所创造的最美好的成果。”

高尔基曾经幽默地说过：“假如有人向我建议：‘你去学习吧！不过为了你去学习，每到星期天，我们要在尼古拉耶夫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就是这种条件，我也一定会接受的。”

虽然这只是一句戏言，但是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见高尔基对书籍的痴迷与嗜好。

书缘，标志了高尔基的执著的精神的追求的开始。

三、喀山的“大学”

强烈的求知欲，使16岁的高尔基萌发了上大学的愿望。1884年，高尔基辞别慈爱的外祖母，来到了喀山。

喀山是当时俄罗斯的一个文化中心，有很好的博物馆和教育机关。最吸引高尔基的，是那所皇家喀山大学，列夫·托尔斯泰和列宁都曾经就读于此。

可是，高尔基一到喀山就发现：富丽堂皇的喀山大学是不属于贫寒的他的。他必须首先谋求生存。结果，他开始了进社会——这所“大学”的生涯。

喀山的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大学教室”。高尔基成了一个流浪汉。在那个时候，流浪汉们居住在城市公园里、河滨的洼地和裂缝里，在木筏上、桥洞下、码头上和市场的货摊上谋生活。冬天一到，他们就得挨饿受冻。更可怕的是警察们的绳索、手铐和监狱在等着他们。“身份不明的人”要被脱光衣服挨树条抽打和被罚做苦工，甚至要被戴上镣铐解往东西伯利亚去。

在他们当中，高尔基觉得自个儿好像是一块生铁投进了烧红的炉火里一样，每天都给他的心上留下许多尖锐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我看见那些狂热露

骨、生性粗野的人们，在我面前旋风般地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敢于憎恨，对世界的一切敢于嘲笑，对自己又满不在乎的乐观态度。”

由于偶然的机，高尔基认识了小商人安德烈·捷林柯夫。他是一个食品杂货店的老板。在这个老板的房间里，有一个秘密的贮藏室，其中暗设了一个图书馆，里面是一些禁书。主要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的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什勃罗留波夫和谢德林等人的政论著作。从这时起，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代替了高尔基过去读的那些冒险故事和小说。

每到晚上，许多大学生、中学生和一些秘密的革命者就会从喀山城的各条街道跑到捷林柯夫的小铺子里来。他们分析沙皇的统治、祖国的前途，慷慨激昂地相互争辩。高尔基终于接触到了另一个圈子的人，他们对生活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个人温饱和个人恬静生活的关心，而且深信能够改变这种生活，他们说出来的这些话，有些是高尔基想说但并未说出的，这使得他分外欣喜。更使他兴奋的是，他已朦胧地感觉自己或许能在改变生活的事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冬天要到了，高尔基在一家面包作坊里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老板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工作繁重，作坊像座监狱。高尔基偷偷地给工人读一些禁书。有时候他讲得很成功，工人们浮肿的脸上现出悲痛的表

情，眼睛里冒着怨恨和愤怒的火花。高尔基开始用书籍来做“改变生活”的工作了。

不久，高尔基去了捷林柯夫开的面包店。他每天给机关和神学院的学生分送面包，同时把革命书籍藏在面包篮里送给他们。

然而，人在年轻时往往总会有些精神危机。因为他们的理想总是比较美好，而社会现实一开始却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就成功地描写了一个伤感少年自杀的精神历程。1887年的秋天，19岁的高尔基也处在精神危机中。他不仅对许多人生问题都找不到答案，反而看到了理论书籍与实践的巨大差距。在大学生中，他是一个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的人，大学生把他看作是“人民的儿子”，他们把跟他的交往仅仅看作是“信任人民”这一口号的行动体现。在工人当中，因为他只是偶然接触一下，时间很短，所以也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同时，他的工作十分繁重。他的朋友捷林柯夫的面包店即将破产。此时，他还听到了慈爱的外祖母阿库林娜逝世的消息。这些，都使高尔基感到孤单和痛苦。这时，高尔基绝望了，他选择了一种可怕的逃避方式。

在1887年12月12日，高尔基从市场上买了一支旧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

子弹没有打中心脏，只打穿了肺叶，留在了背部

的皮肤里。经过手术，高尔基被救活了，过了一个月就好了。

但是，从自杀这件事后，高尔基就十分自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像是对人们犯了罪过，没有脸再活下去。这时，他遇到了一位民粹派革命家——罗马斯。这位刚从流放地回来的高个子，对高尔基很是关心。他邀请高尔基到克拉斯诺维多沃村去，他在那开了个小杂货店，那其实是一个渔民互助组，为了在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

高尔基在这里接触到了社会另一个阶层——农民。他常常跟他们交谈。生活充实起来了，高尔基渐渐抛却了自杀给自己心理上带来的阴影。但这些愉快的日子不多久就结束了。因为村长和富农的敌视，罗马斯的小店被人放火烧毁了。

1888年秋天，高尔基只好离开了这个村子，从此也离开了喀山。

喀山，是高尔基在精神上获得生命的地方。多年以后，高尔基回忆说：“喀山是我最喜爱的一所大学。”

四、真实的告白

——自传体小说三部曲

高尔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在二、三十年后，成为了他的一笔巨大的、不可多得的财富，即创作素材。1912到1913年，他写了《童年》；1914到1915年，他完成了《在人间》；1922年，他创作了《我的大学》。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就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

高尔基曾经建议他的传记作者以三部曲为准核对传记材料，可见三部曲材料的真实可靠。同时，这也正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全部魅力的来源。

《童年》讲述的是小阿辽沙在父亲死后，跟随着母亲，回到外祖父家的一段童年生活。

外祖父年轻时精明强悍，挣下了一份家业。但年老后脾气暴躁，待人凶残。孙子们和阿辽沙常常挨他的揍。两个舅舅为了瓜分家产常常相互辱骂、大打出手。他们为人也极为粗暴，两个舅母都是被他们折磨死的。家中有个善良、能干的学徒茨冈，也被舅舅们害死了。

随着外祖父的破产，家道一天天地败落。外祖父

赶走了为他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工人葛利高里。被生活所逼，母亲不久嫁给了一个文人，继父对继母很不好。在这些岁月里，只有慈爱的外祖母讲述的美妙童话故事和对聪明、能干、善良的父亲回忆温暖着阿辽沙的心。

但是不久，变得吝啬刻薄的外祖父也逼白发苍苍的外祖母去自谋生活了。小阿辽沙为帮助祖母，拾起了破烂。

母亲因为生活的折磨，生病而死。死后没几天，外祖父狠心地把年仅11岁的阿辽沙送到了人间。

在《童年》中，高尔基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形象。一旦翻开书页，你就再也不愿意轻易合上。高尔基以一种极其纯朴的叙事方法，把我们带回到19世纪后期，那个在暗淡油灯摇曳中，四处氤氲弥漫的古老的俄罗斯家庭。

高尔基不是以一个成年人的回忆的形式，而是以一个叫“阿辽沙”的小男孩的眼睛，重现了这一切。

外祖母“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她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好玩极了……”

外祖父呢，在小阿辽沙的眼里，却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胡子是赤金色的，有着一副鸟嘴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

就连一个小舅母，也从童稚的观察中活灵活现地出现：

“教我念祷词的是那个稳静而胆小的娜塔莉亚舅母，她的小圆脸跟儿童的一样，眼睛透亮，我仿佛觉得，从这对眼睛里可以看见她脑后的一切。

“我喜欢看她的眼睛，目不转睛地长久地看着；她两眼眯缝着，脑袋转来转去，悄悄的，几乎像耳语似地恳求说：

“喂，请你说：‘我们在天之父……’”

寥寥几笔，就刻画出一位胆怯然而善良温柔的妇女来。

这样的传神之笔在书中随处可见。

然而深深吸引住读者并产生震撼的是笼罩在全书当中的那种残酷的真实。

舅舅们的骨肉相残、外祖父对外祖母的辱骂、继父对母亲的拳打脚踢和时时有可能落到阿辽沙身上的鞭子……作者是以一种平静的口气来说这一切的。在这种平静当中，高尔基客观地，不加评论地描述着这些丑恶。这却成为暴露丑恶的最成功的揭露手法。

在外祖父破产以后，发生了一件事：

“在卖房子前不久，有一天早晨喝茶的时候，他忽然向外祖母阴沉地、坚决地宣布：

“‘喂，老婆子，我养活过你，现在我养够了！你

自个儿挣饭去吧。’

外祖母态度非常安详地听着这些话，就好像她早就知道他这样说，并且在等待着他说。她不慌不忙地掏出鼻烟壶，用她海绵似的鼻子吸了吸，说道：

“‘ 那么好吧！既是这样，就这样好了…… ’”

一个操劳了一生的老妇人竟然在丧失劳动力之后被吝啬的丈夫赶出了家门。生活在阿辽沙的面前展现了多么残酷的一面。高尔基没有评论，却留下了让读者充分感受的空间，让读者体会到生活在一个幼小的孩子的心灵上造成的摧残。

《童年》是一本独特的自传。它仿佛如绘画般形象，一切却可以在眼前浮现。但它并不像大多数自传那样，以一个主人公为形象创造出一幅肖像来。它更多地像一幅长卷的斑斓的油画，复原了一个时代，一个家庭里的一段生活。这段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主人公。无论是美的(外祖母、父亲、茨冈等)，还是丑的，(祖父、舅舅等)都同时站在读者面前，冲击着读者的心灵。我们不得不一次次捺住激动，继续看下去。这种巨大的神奇的感染力，是为许多批评家所称道的艺术效果。有的西方评论者甚至认为《童年》是高尔基最杰出的作品。

《在人间》是在《童年》发表后两年完成的。它接《童年》的结尾——阿辽沙被外祖父赶出家门开始

叙述，一直讲到他打算去喀山上大学。在《在人间》里，小阿辽沙接触到的就不仅仅是家庭了。他看见了大量的社会的贫穷、痛苦，也更多地接触了不平等现象。高尔基保持了《社会的童年》的特点，他所描绘出来的图画依旧色彩鲜明，既清晰，又引人入胜。人物性格特征也刻画得真实，这部作品在当时颇受好评。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这部作品，无论是从主题探索还是从写作手法上，都与前面两部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的大学》讲1884年，高尔基到喀山生活的故事，是一个青年人的精神历程的真实写照。它讲的是“我”在俄罗斯大地上徘徊流浪、四处观察，目的是要了解自己的祖国。“我”内心丰富，善于思索，对生活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对人民的命运思考得很多。这种过程又是和主人公为了生活，而在喀山的码头、大杂院四处奔波的过程齐头并进的。在主人公与流浪汉、小市民、知识分子的交往中，一个青年人的心灵世界向读者开启。生活阅历、精神思考这两者在《我的大学》中占据了同样的份量。作者不再是《童年》中那个冷静、客观、藏匿了自己的叙述者，他变成了痛苦的精神追求者和激情洋溢的评论者。

然而，无论是作者描写的生活阅历，还是思考，都具有贯穿在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灵魂——真实。

在《我的大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年人的世界，它比《童年》中儿童的世界显然要广阔许多倍，而且涉及了人最深处的心灵世界。但《我的大学》仍然和《童年》一样，具有惊人的真实性。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记下了在码头上的一个劳动场面。他充满诗情地刻画了这一场面。他热情地讴歌了劳动者：

“船舷外面波浪翻滚，甲板上的大雨哗哗地落，河面上狂风咆哮，在黎明的薄雾里，这群水鸡儿似的半裸的人们，一个劲儿地跑来跑去，喊着、笑着，夸耀着自己的力气和劳动。”

“好像无论什么东西也抵挡不住那般快活、奋发的强大力量，它能够在大地上创造奇迹，能够像神话故事里所讲的那样，一夜工夫就遍地建起美丽的宫殿和城市。”

这种观察是真切的，和环境契合的；这种讴歌是有感而发、毫不做作的，它们都令人信服、接受。

但清醒的作者同样看到了“劳动的人们”——流浪汉的阴暗面。他们生活在污浊的环境里，尽管保持着勤劳、能干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观念和庸俗习气的感染，在他们身上，粗野、下流等污垢尤为明显。他把这一些同样记录了下来，而没有陷入盲目的讴歌当中。

茨威格曾经对高尔基这样赞美过《我的大学》的艺术成就：“我已经多年没有感受过只有在您写的带回忆性的作品中才感到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那种开朗、人性的真挚之情……我承认，我很羡慕您善于如此朴素清晰地描写事物的才华。在欧洲，谁也没有这样的才华，甚至托尔斯泰也没能写出如此高度的朴实无华。”

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因为真实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这种真实不仅仅指书中叙述的内容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也不仅仅指作品的叙述语调是公允的，它更多的是指作者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客观真实的。三部曲展示的其实是高尔基对于生活的主观体验，但严肃的生活态度使这一切变得客观。这也是为什么在三部曲中描写的是最苦涩的、“铅一样沉重”的世界，洋溢的却始终是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原因。

五、生活的馈赠

离开喀山时，高尔基已经20岁了，长成了一个体格魁梧、身材高大的小伙子。

他又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从喀山的克拉斯诺维多沃村出发，走到了阿斯特拉罕，在里海做了船夫和渔夫。后来到了察里津，在一个小火车站当了守夜人。不久又调到了 博里索格列勃斯克 的货车站去当看守员。

在这位年轻人幻想着做出某种惊人的业绩，幻想着欢快的生活的年龄里，他只不过看守着麻袋、防水布和木材。在他读着海涅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他周围的现实生活在静悄悄地腐烂着，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使他痛苦。高尔基又重新陷入到彷徨和孤独当中。

高尔基诅咒着这一切，他开始幻想建立一个农业移民区。他认为，在那里，他可以同朋友们过独立的生活，自己耕地、播种，用自己的双手去收获庄稼。那里没有上司、没有老板、也没有屈辱的生活。

他想到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那几年曾经鼓励建立农业移民区。于是，高尔基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要求托尔斯泰分给他一块地。信里写道：“……

据说，您有许多没有耕种的土地。我们请求您把这样的土地给我们一块。”落款是：“下诺夫戈罗德市民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克·彼什科夫代表大家谨上。”

接着，高尔基设计了经过图拉和莫斯科、最后到达雅斯纳雅波良纳和哈摩夫尼克的行程。他要到那里去面见托尔斯泰。

他把写着诗的笔记本和一篇他所认为“绝妙的散文长诗”——《老橡树之歌》，塞进了背包，离开了车站，带着希望步行了千里。

可是，高尔基在两个目的地都没能见到托尔斯泰。他曾经这样记下了事情的失败：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注：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告诉我，他到特罗伊乐—谢尔基耶夫斯卡雅修道院去了。我是在那间满满地堆着一捆一捆书的杂物房门前的院子里遇见她的，她把我引到了厨房里去，亲切地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小面包。她在谈话中对我讲起，这总有很多‘来历不明的游手好闲的人’来麻烦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而且在俄国，游手好闲的人总是非常之多。”

这次经历后，高尔基回到了下诺夫戈罗德。

这时，高尔基已经没有家了，他跟一位学生住在一起。

学生叫索莫夫，是个革命者，当地的宪兵接到密

令，要逮捕他。高尔基机智地帮他毁掉了重要的书籍和文件。但在回答宪兵的质问时，高尔基控制不住自己对这些人的厌恶，言辞态度都分外激烈。为此，他遭受了逮捕。虽然不久以后，因“罪证不足”把高尔基放出来了，但从此以后，他就被列为“危险分子”，时常处于当局的监视之下。生活，开始向高尔基展示了它狰狞的面目。

这件事后不久，高尔基到了律师拉宁的事务所当了秘书。但空虚和苦恼仍然不时袭击着他。为了摆脱这种空虚和苦恼，他决定作一次长途旅行，去观察人民的生活。

1891年春天，高尔基离开了故乡，带着“人们终日所想的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了对几乎整个俄罗斯大地的漫游。这次漫游长达几千俄里，他沿着伏尔加河步行，乘船来到察里津，穿过顿河草原，走遍了乌克兰原野。他南下敖德萨，向多瑙河而去，直到罗马尼亚边境。秋天，他由比萨拉比亚折回，沿着黑海自西向东，经过克里米亚，最后在1891年11月到达了高加索的首府第弗里斯。

在旅途中，他做过各种工作：装卸工人、雇农、渔夫、晒盐工人、搬运工等等。他多次历险：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当众折磨一个妇女，就跑过去干涉，结果自己被打得半死；在盐场上，他一昼夜劳作长达15

个小时，干着不是人干的活儿；流浪汉跟他捣鬼，用劈裂了的车把手把他手掌的皮肤都给撕了下来；他真心帮助了一个流落他乡的少爷，并千里迢迢送他回家，却差点被此人诽谤、出卖……更别提在刻赤海峡，他几乎被淹死；在格鲁尼亚的暴风雪中，他又几乎被冻死；在迈科普，他第二次被逮捕。

生活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因为它可以教给人们书本上没有的许多智慧。而且生活中的智慧总是比书本中的智慧更深刻、更丰富。

从1888年到1892年的两次游历使高尔基克服了长期以来盘踞在他心头的彷徨与痛苦。同时，高尔基比同时代的作家有了更丰富、复杂的下层社会的生活经验。他深刻地了解了人民思想和愿望，这使他成为人民的诚实而卓越的代言人。

同时，丰富的生活积累给高尔基提供了无数的创作灵感，不管是早期的短篇小说创作，还是他以后作品的素材，源泉都是这些年头里丰富而艰苦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是高尔基得到的一笔无上的馈赠。他曾经自豪地说：“我这个够倔的俄罗斯人，年轻时就装够了火药，火力够多年用的。”

六、走上文坛

1891年11月，高尔基抵达了高加索的首都第弗里斯之后，结束了他的漫游。

对高尔基来说，第弗里斯是个极有意义的值得纪念的地方。因为在这里，他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高尔基之所以能在这时走上文坛，是因为两位“导师”的帮助。这两位“导师”是卡柳日内和柯罗连科。

卡柳日内是民意党人，曾被流放过，后来成为了第弗里斯的移民。他极有知人之明，他与高尔基结识后，发现了高尔基是个与众不同的青年。他不仅阅读过众多的文学名著，极其看重精神生活，还喜欢对社会现象进行各种思索。卡柳日内很是欣赏他。

有一次，高尔基向卡柳日内提起他在此萨拉比亚流浪时，在吉卜赛人的帐篷里，听到了一名叫马卡尔·楚德拉的老吉卜赛人讲的关于拉达和左巴尔的传说。卡柳日内敏感地觉出了这是个好故事，而且适合于高尔基创作，高尔基也一定能把它写出来。于是，卡柳日内鼓励高尔基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短篇小说。小说写好后，卡柳日内把它介绍到第弗里斯的《高加索报》。1892年9月，这篇小说正式问世。这就是《马卡尔·楚德拉》——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克西

姆·高尔基”这一笔名也自此诞生。

多年以后，高尔基极为激动地给卡柳日内写下了这样的信，表达了他对卡柳日内的敬意与谢意。

“我亲爱的朋友和老师，亚历山大·麦福季耶维奇！

“自从我有幸同您相识以来，已经过去了34年了；而从我们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以来，也过去了22年了。

“在此期间，我结识过数百人，他们之中有的是了不起的、卓越的人物。可是，请您相信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在我的记忆里使您的形象黯然失色。

“这是因为，亲爱的朋友，您是第一个像对待人一样对待我的人。

“在我的记忆里，您第一个用您那温柔的使我永不能忘怀的目光看我，您不光是把我看做一个有奇怪经历的小伙子和漫无目的的流浪汉，看做一种有趣的而且是令人纳闷的东西。当您在倾听我讲述我的所见所闻和我自己本人的经历时，我记住了您的眼睛。那时我就明白了，在您面前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觉得，正是由于您，我一生才未曾自我吹嘘过，没有抬高过自己的身价，也没有夸大过我饱经风霜的一生的痛苦。

“我是说，您是第一个使我能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人，我已经为俄国艺术服务了30多年，这要归功

于您的促进。

“……老朋友，我亲爱的老师，我紧紧地握您的手！”

但实际上，尽管有卡柳日内的帮助，尽管《马卡尔·楚德拉》一发表就成功地受到了好评，高尔基刚开始时对自己写出来的作品还是很没有信心的。这跟他第一部长篇作品《老橡树之歌》的失败有很大关系。

那还是在1889年，当高尔基第一次漫游回到下诺夫戈罗德时，他决定去拜访作家柯罗连科，请他看一看自己写的长诗。

高尔基对《老橡树之歌》是充满自信的，他觉得自己把近十年来丰富多彩的艰苦生活中所想过的一切，全塞在这篇作品里了。人们一定会因为其中描写的新鲜事物和真理感到满意的。可是，结果大出他的意料。柯罗连科没有赞赏这部长篇诗，而是简短而生动地向这个青年谈了一下这首长诗的毛病，其中主要是语言和风格上的缺陷。高尔基一下子受到这个打击，只想赶快含羞逃走。他决定不再写诗，也不写散文了。果然，这之后的两年里，他真的什么也没写。直到遇上了卡柳日内，写出了《马卡尔·楚德拉》。

自从1892年《马卡尔·楚德拉》发表后，高尔基一发不可收拾，接二连三地创作了更多短篇。如《叶美良·皮里雅依》、《科利亚的梦》、《报仇》、《撒

谎的黄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等等。柯罗连科被这些小说所打动，很想跟作者见见面。

柯罗连科一见面就认出了这个年青人，他用赞叹的口吻谈起了高尔基的作品。他认为高尔基的小说写得很有独创性，虽然也存在着安排得不够妥当和粗糙的毛病。

临别时，高尔基迟疑了一下，问道：“您认为我可以写作吗？”

柯罗连科有点诧异地大声说：“当然啊！您不是已经写了，而且发表了吗？……”

高尔基一下便如释重负。从此以后，柯罗连科成为高尔基的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具体的指点者。

1895年2月，柯罗连科还推荐高尔基到《萨马拉报》工作，使高尔基终于摆脱了困顿的生活。

高尔基几乎每周在《萨马拉报》上发表一篇新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有一次，在秋天》、《游街》、《筏上》、《我的旅伴》等著名短篇就是在这个时候创作出来的。

此外，高尔基还负责《速写与随笔》一栏，并写每日杂感。

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对庸俗、卑鄙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并且屡屡想方设法闯过检查官的钳制。

作为记者，高尔基写的最后一组报道是关于全俄

工业展览会的。1896年，各种刊物都在大肆吹捧展览会展示的成就，高尔基却真实地揭露了工人的痛苦生活。

1897年，高尔基摆脱了紧张的报馆工作，开始了专职作家的生涯。

真正给高尔基带来声誉的是他的《特写与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优美有力的短篇小说赢得了众多的读者。1898年，在三个月内，第一、二卷卖完了6000多册。不到一年，再版的三卷集又销售一空。这在俄国出版界是前所未有的。要知道：这些作品只不过在省报上刊登过而已呢。

1899年，高尔基的声望已经非常大了。在首都，举办了庆祝他的文学晚会，做了关于他的演讲，撰写和出版了关于他的小册子。当巡回展览会上出现了列宾画的高尔基的一幅肖像画时，这幅画就成了展览会上“最精彩的东西”。青年人怀着关切、崇敬的心情围拢来注视这位新作家的面容。

这一年，高尔基不负重望，为读者奉献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福马·高捷耶夫》。

小说的主人公福马出身于商人暴发户的家庭，父亲晚年得子，对他很是溺爱。儿童时代的福马，性格是傲慢而大胆的，虽然父亲和教父从小就对他灌输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但福马对如何成为干练的资本家

却一点也不感兴趣。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看到社会中处处尔虞我诈，资本家人人都贪婪，因而他对现实极为不满。他甚至羡慕那些四海为家的流浪汉和出卖体力的劳动者，觉得他们的生活才是新鲜的。

父亲死后，福马成了百万家财的继承人。但他仍然没有寻找到生活的意义，精神的痛苦使他认为只有荡尽家财才能自由，于是他沉湎于酒色，甚至进行恶作剧。

残酷的现实仍然无时不刻地折磨着福马。一天，为庆祝一条新轮船下水举行了一次宴会。正当资本家觥筹交错的时候，福马站出来痛骂全城的资本家：“你们这些恶棍！你们建立的不是生活，而是监狱！你们创造的是束缚人的锁链！你们是杀人犯！……”正当福马痛快淋漓地揭发他们的罪行的时候，周围的资本家把他绑了起来。他的教父马耶金眼看吞并福马财产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宣布福马神经错乱。于是福马被送进疯人院。

高尔基在小说中描写了很多形象。

福马的父亲伊格纳特是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从船夫头变成大富商的。他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在争夺金钱的斗争中，闯出了天下。

福马的教父马耶金是老谋深算的另一类型资本家。他的人生哲学是：“不做吃人者，就要被人吃。”他为

满足自己的贪欲，手段毒辣地把福马送进了疯人院。

福马则是与资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一个人物。他深刻地看到了统治阶级的弊病、并痛恨他们；他勤于思索，但最终找不到生活的解答。他也曾经因为苦恼而沉湎于酒色中。但他最终并没有跟资产阶级妥协，没有跟罪恶妥协，他依靠个人的力量进行了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最终是软弱无力的。福马是一个出身于统治阶级、却被统治阶级扼杀的叛逆者形象。高尔基形象地称福马为资产阶级的一只“白色的乌鸦”。

《福马·高捷耶夫》成功地暴露了俄国资本家的罪恶本质，高尔基从此得到了更多的爱戴，也招致了许多人的恐惧和仇恨。

《福马·高捷耶夫》发表后，成为轰动一时、争相传阅的作品。也是从这时起，高尔基引了更多西欧文学家、批评家的注意。

七、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创作

《福马·高捷耶夫》的成功是基于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创作经验之上的。在高尔基创作短篇小说后，才积累起丰富的写作经验来的。没有这些写作经验，《福马·高捷耶夫》就不会达到这样的艺术高度。高尔基一生写了几百篇短篇小说。他认为写短篇小说对于训练简洁的文风很有益处。后来，高尔基甚至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在他着手写一个长篇小说之前，总要写几个短篇小说练练手。

高尔基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马卡尔·楚德拉》，这也成为高尔基进入文学圣殿的敲门砖。它讲述了一个爱情和自由的故事。青年左巴尔跟少女拉达彼此相爱，但为了生活自由和人格独立，最后不惜抛弃宝贵的爱情，表达了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

小说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创作的，情节富有传奇性，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很大。

高尔基还写过《少女与死神》、《小仙女与青年牧人》。他们和《马卡尔·楚德拉》一样都属于通过自由与爱情反映社会问题，表达思想的浪漫主义作品。

《少女与死神》讲的是：沙皇打了败仗回来，路

过一个村庄，听见一个恋爱的少女欢乐的笑声，他恼羞成怒，命令随从把少女交给死神。但这个少女既不怕沙皇，也不理睬死神。在爱情力量的感召下，死神终于让了步，准许少女继续留在人间。

《小仙女与青年牧人》讲的是：林中小仙女被一个牧人的歌声所吸引。于是，她不顾母亲与姐姐们的劝阻，终于投奔草原而去。最初，草原生活是新奇的，牧人的爱情也令小仙女觉得很幸福。后来，暴风雨忽然来临，草原上雷鸣电闪，大雨倾盆，小仙女的幸福感顿时一扫而光。她虽然依旧依恋着青年牧人，但更向往母亲身边的恬静生活。于是她回到森林，却发现母亲已经不幸去世。小仙女遭到姐姐们的责难与冷落。后来，在青年牧人歌声的召唤下，小仙女又回到了草原，欢乐的春天和夏天很快逝去，可怕的秋天即将来临，小仙女与牧人的共同生活蒙上了越来越厚的阴影。她感到在草原上孤独、恐惧，牧人也为失去的自由而郁郁不乐，最后小仙女终于在忧虑、惊悸中死去。

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赞美对理想的不倦追求，谴责对舒适、静谧、消极的生活的眷恋。

1895年，高尔基创作了《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它们成为高尔基短篇小说当中的名篇，为很多读者所熟悉。

《伊则吉尔老婆子》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方式。

它讲的是：

有一天，伊则吉尔老婆子向过路人“我”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腊拉的神话传说。一只雄鹰把一个部落里的一个少女抓走了。20年后，当年的少女带着与鹰生养的儿子腊拉回到了部落。腊拉孤傲、自私，他一回来就杀死了一个拒绝了他的爱情的少女。部落里的智者决定让腊拉离开部落。这正中腊拉下怀，此后他需要什么来族人这里抢掠。

终于有一天，腊拉想死了。然而他发现自己是个死不了的人。他痛苦万分，最后变成了一具虚幻的影子。

第二个故事开始了，伊则吉尔老婆子向过路人谈起了她自己的身世。

年青时，她长得十分迷人。她把用姿色来勾引男人，作为生活的全部内容。她一次又一次抛弃了男人，男人也一次又一次抛弃了她。到老了，她也没有得到幸福，成了一个活着的躯壳。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丹柯的英雄传说。

古时候有一族人住在浓密的树林里。后来，异族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并且把他们赶向树林深处。在那里，人们难以生存。丹柯是一个勇敢、智慧的青年。他自告奋勇地领人们走出森林。当大雷雨来临时，林

子里漆黑一片，黑暗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开始责怪丹柯。丹柯痛苦极了，突然抓开了自己的胸膛，掏出了他的心，把它高高地举在头上。他的心熊熊燃烧，照亮了道路。人们出了森林，丹柯却倒地死去。

第一个故事谴责了腊拉的狂妄、孤独和极端自私自利。第二个故事批判了虚度年华、无所作为的人。第三个故事歌颂了为集体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

这是一篇意义深邃的作品。三个故事都从短小精悍的篇幅中体现了哲理性。在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不少闪烁着智慧的格言。例如，丹柯用“不能够用思想移开路上的石头”来说明什么事都不做的人，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道理。

但《伊则吉尔老婆子》最大艺术成就就在于作品的结构严谨，行文优美。

三个故事由叙述者伊则吉尔老婆子连接起来，保持了一致的口述的风格。三个故事实质上都是对生活的意义进行探讨，最后，丹柯的故事使主题得到了最深入的揭示。

作品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语言形象而生动，富含想象力，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交错出现。故事中不断地描写周遭的环境，以自然氛围的变化来暗示故事内容的变化。

《鹰之歌》是后来高尔基写的散文《海燕之歌》

的姊妹篇。它以对比和象征的手法刻画了蛇和鹰的形象，蛇热爱峡谷里温暖、舒适的生活，而鹰追求辽阔的天空，蛇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于安于现状，害怕斗争，缺乏理想的小市民的鞭挞，鹰则表达了作者对追求光明、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的赞美。

丹柯和鹰是高尔基创作中最早出现的英雄形象。在高尔基投身到文艺创作中时，他是从生活中寻找素材的。他总是忘怀不了年轻时在流浪汉中度过的岁月，因此，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流浪汉成为一个重要的描写对象，形成了一个“流浪汉”短篇小说系列。这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较为著名的有《叶美良·皮里雅依》、《切尔卡什》、《玛莉娃》等。

《叶美良·皮里雅依》的主人公叶美良是个40多岁的流浪汉，过着比狗不如的生活。出于对富人的仇恨，他潜伏在桥头准备抢劫一个商人。这时，他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因失恋而想投河自杀的少女。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满怀同情去安慰她，帮助她恢复生活的勇气。

在《切尔卡什》中，高尔基塑造了一个独立不羁、饱经沧桑的流浪汉切尔卡什。他雇佣破产的青年农民加弗里拉深夜泛舟，盗卖码头上的货物。在紧张的走私生活中，切尔卡什表现得沉着大胆而机智，加弗里拉却显得胆小迷信。可是，第二天分钱时，加弗里拉

起了贪心，想杀死自己的伙伴，独吞巨款。切尔卡什轻蔑地把钱全部掷给了加弗里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觉得自己尽管是一个贼，一个和一切亲属断绝了关系的流浪汉，却永远不会这样贪婪，这样下贱。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刻画了两个流浪汉迥然不同的性格，揭示了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作者借描写切尔卡什对大海的感受来烘托他爱好自由的性格：“他这个小偷却是喜欢海的。他那激烈的神经质的天性，渴望得到各种印象的天性，喜欢对着这黑沉沉的、无垠的、自由而有力的广阔空间沉思冥想，从不感到腻烦。”同时，作者着重描写加弗里拉对待金钱的态度，目的是想以此来衬托切尔卡什那种不为金钱所奴役的高贵品质。

《玛莉娃》中的女主人公玛莉娃在性格上和切尔卡什很相似。她热爱大海，向往着像海鸥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竭力保持妇女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她鄙视农民的自私，乐于与流浪汉为伍，放荡不羁，玩世不恭。但最终仍没能得到幸福。

流浪汉是旧俄罗斯的畸形产物。他们受尽残酷压榨，从肉体到精神都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他们憎恨不合理制度，蔑视现存秩序，渴望改变生活困境，但又不了解受苦难的社会根源，缺乏明确的生活理想，消极悲观，自暴自弃，他们现实的反抗是自发的，盲目

的。他们生活在污浊的环境里，高尔基通过自己的创作真实反映流浪汉的非人生活，对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出愤怒控诉和抗议。他一方面同情流浪汉的不幸，肯定他们对于改变现实的合理要求，赞赏他们的精神；另一方面批评他们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思想。高尔基清醒地认识到，流浪汉不是改造社会的革命力量，他们充其量是反抗现实的临时的英雄。”所以，在小说《切尔卡什》的结尾是切尔卡什头部负伤，钱也丢了，孤独地消逝在海港的深夜中。当加弗里拉说他是“一个社会上谁也不需要的人”时，他无言以对。高尔基严峻的目光看到了切尔卡什的弱点：他只不过是一个被生活遗弃的人；他只不过有时对社会发泄消极的不满。

流浪汉系列已显示出高尔基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高尔基应用这种主义的创作手法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对小市民的批判。在《因为烦闷无聊》这个著名短篇中，高尔基以朴实的艺术手法，叙说了令人怵目惊心的故事：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和他属下的职员，因为烦闷无聊，寻求开心，便以恶作剧来嘲弄厨娘阿琳娜的爱情，逼得这位软弱可怜的女人屈辱难忍，自杀身死。这个来自日常生活的故事，深刻地表达了高尔基生活在小市民当中，对他们自私自利的清醒认识和极端憎恨。

高尔基还写过以儿童为对象的短篇小说。和契诃夫创作的著名题材的小说相比，它们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1894年，高尔基在《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中描写了一对四处流浪的祖孙两人的不幸遭遇。廖恩卡和爷爷尽管贫穷，但穷得有志气，不做偷窃的营生。廖恩卡希望跟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交个好朋友，却遭到了对方的怀疑。一天，小女孩的披肩丢掉了，大家都怀疑是廖恩卡偷窃的。但廖恩卡发现了真正的“窃贼”是爷爷，他实在是穷得走投无路了。廖恩卡不理解爷爷，委屈地指责了他。爷爷只好离他而去，惨死在草原上。廖恩卡为了找爷爷，在暴风雨的夜晚摔死在峡谷里。祖孙两人都是善良的，是贫穷把他们逼上了绝路。这个故事深刻反映了生活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

第二年，高尔基发表了《科柳沙》。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故事。12岁的男孩科柳沙因为家境十分贫困，故意去撞马车，让马撞伤自己，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获得路人的同情和施舍，帮助家庭度过难关，不料自己白白牺牲了生命。科柳沙的形象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童稚的想法和严峻的现实形成了强大的对比，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1899年，高尔基创作的《二十六个和一个》成为评论界瞩目的作品。作家描写了在一个监狱的地

窖里，26个面包工人像囚犯一样整天从事着沉重的、乏味的劳动，身心倍受压抑。只有一位年轻活泼的女工每天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欢乐，他们是心目中的太阳，可是，一位大兵出身的流浪汉勾引了她，糟蹋了他们视为神圣美好的东西，26个工人只能用咒骂和嘲笑来发泄心中的愤怒。这是较早的以俄国工人阶级作为描写对象的一个短篇小说。它反映了工人的悲惨命运和他们渴望摆脱奴隶地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指出了自发性反抗并没有使被压迫人民获得自由解放。这个短篇小说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高尔基在创作后期也写了不少短篇小说。1923年创作的《俄罗斯漫游记》、《一个人的诞生》和《大灾星》等成为其中颇为著名的作品。

短篇小说是高尔基运用得最早、最为娴熟的一种文体。他的浪漫主义名篇充满了对美与自由的强烈向往和讴歌，他的现实主义短篇则把笔触伸到了罪恶丑陋的现实深处。他尤其善于真实地描写环境的恶劣，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铺展开普通人的命运，却往往最能触动人们的心弦。它们都通常有着根源于民间文学的朴素而优美的语言和干净利落的结构，简洁有力地表达出最深刻的思想。这些优美、隽永的短篇小说，成为世界文学当中的一株奇葩。

八、峥嵘岁月

高尔基对社会丑恶的大肆抨击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恐慌。警察监视机关加紧了对作家的注意。

1898年，当局借口高尔基涉嫌阿法纳西耶夫案件，把高尔基逮捕了。因为查无实据，高尔基很快就出狱了。但从此之后，高尔基受到了“特别监视”。这就是说，如果高尔基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处去，必须经过宪兵队的批准，而且必须按指定的路线走，在任何地方也无权停留，除非是生病或者遇到了某种无法克服的原因，并且要把停留的情况告诉当地警察局。

有人在回忆录中饶有风趣地写道：对于高尔基的监视“采用过许多不同的方式，一般的警察长官都恭而敬之地盯着他；耀武扬威的宪兵（穿便服和穿军装的）看守着作家日常生活中必经的一切道路，而顽固的密探则以各种面目出现，极力要打进作家的住所里去。”

高尔基却采用警察们无法禁止的公开社会活动进行了反抗，他为穷人孩子征集助学金，号召捐款修建免费溜冰场，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张罗修建宿舍，也为下诺夫戈罗德的孩子每年举办一次隆重的新年枞树晚会，数千名孩子在晚会上可以得到衣服和其他赠品。高尔基表现了他对儿童的热爱与对来自底层的人

们的深切关怀。他有那么多川流不息的拜访者，可怜的密探根本没法弄清，其中谁是“重要人物”。

出于对自由、对光明的向往，高尔基很早就和革命者有了接触。

1900年，列宁秘密创办了《火星报》。高尔基托人转交给《火星报》组织500卢布。从这以后，高尔基经常把自己辛勤创作得来的稿酬贡献到正义的事业中去。他后来曾寄给日内瓦的革命者一张5000卢布的支票供出版《前进报》之用。1905年，在一封信里，他又谈到要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2000卢布。

1901年，他接受了下诺夫戈罗德—索尔莫沃委员会的委托，去彼得堡购置一台给索尔莫沃工人印传单的油印机。这件事被警察获悉了。

1901年3月4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广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是为反对《暂行条例》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政府对参加者进行了大屠杀。高尔基亲眼目睹了这场血腥镇压，他立即在一些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联名写的《控诉政府抗议书》上签了名，并亲自写了一份《驳政府报道》的传单。

于是，1901年5月，高尔基再一次被捕入狱。70岁高龄的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妻子彼什科娃等人多方奔走，要求释放高尔基。这时，高尔基肺

病又加重了,当局只好把高尔基释放出狱,在家软禁。为了“防止和根除其犯罪活动”,沙皇政府想出了一个罕见措施——在高尔基的寓所厨房里,他们派了一个警察;在过道里,也有一个警察;高尔基只有在其中一个警察的监随下才能上街。

9日,沙皇政府宣布要将高尔基流放到阿尔扎马斯。这样,惊惶不安的沙皇政府没有经过审讯,就把这位全欧闻名的作家驱逐出他的家乡。但高尔基的病情严重恶化了,所以,警察当局又不得不允许高尔基去克里米亚养病。

下诺夫戈罗德的人们为高尔基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欢送会,这等于是一次在车站上举行的示威游行。散发的传单当中,有一篇高尔基的名篇,这就是《海燕之歌》。

在1901年4月,高尔基写了一篇《春天的旋律》,讲的是一群飞鸟在议论自由,而一只黄雀这时就向伙伴们唱起了这支《海燕之歌》。愚蠢的检查官把前半部分给卡掉了,却通过了《海燕之歌》。

这是一首散文诗,描写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情景,刻画了海燕矫健、勇猛、胜利的身姿。全篇节奏紧凑,激情流泻。它的一些段落,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

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中，乌云听到了欢乐。

海燕在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色，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海燕之歌》采用了以象征为主的艺术手法。自然现象都各有它们的社会意义。如乌云、狂风、雷、闪电是黑暗的反动势力的象征；海鸥、海鸭、企鹅象征着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海燕”在俄文中意思是“暴风雨的报信者”，它象征着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海燕之歌》一出版就被高尔基的全部读者理解为一篇预示革命高涨的宣言，它的浪漫主义激情号召

人们进行英勇的、公开的革命斗争，所以人们把它印成了传单。它也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欢迎。老布尔什维克雅罗斯拉夫斯基曾说：“在我们的文学中，恐怕难以找到一部作品，像高尔基的《海燕》那样，出版过那么多的版本。”

1902年，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养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科学院选举高尔基为科学院名誉院士。警察局气急败坏地把这件事上呈沙皇。结果，尼古拉二世认为“此事荒唐之至”，科学院就声明当选无效。

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对这一做法十分愤慨。他们俩向科学院退回了自己的任命证书，以示抗议。科学院事件说明了沙皇对高尔基的声望是多么恐惧啊。

到1902年的夏天，高尔基到了流放地阿尔扎马斯。在这儿，四处布满了特务。高尔基在窗外站着警察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他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联系，为革命筹集了资金。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02年9月，高尔基恢复了自由，返回了下诺夫戈罗德。他开始把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团结到自己的周围。高尔基从1900年开始就参加了《知识》出版社，后来与皮亚特尼茨基一起进行领导工作。1902年，高尔基与绥拉菲莫维奇结识。此外，该社的成员还包括库普林、安德烈夫、蒲宁、斯基达列茨、魏列萨耶夫等。他们

在政治上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在创作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是当时俄国进步文学的核心。在《知识》出版社的丛刊上，高尔基先后发表过长诗《人》、剧本《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及小说《母亲》等。

当时，还有一个“星期三”文学联合会，由一批与《知识》出版社有联系的莫斯科作家组成，高尔基成为了这个团体的思想上的领袖。

1901年，在回到下诺夫戈罗德城后，高尔基还在整个俄罗斯激起了一股直逼沙皇的热浪，这是由高尔基创作的两部戏剧的首演活动造成的。这两部戏剧，一部是《小市民》，完成于1901年9月；另一部是《底层》（也译成《在底层》），是高尔基流放阿尔札马斯时写完的。1902年1月和1903年，它们先后获得了首演的批准。

无论是《小市民》还是《底层》，它们的首演式都历尽艰难，都值得在戏剧史上大书一笔。

高尔基完成《小市民》的第二年，莫斯科艺术剧院获准演出此剧。1902年10月，剧本的彩排和上演的前几天，剧场里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剧场的工作人员由身穿便服的警察来代替，这可是戏剧史上的一次奇观。

两个月以后，第二个剧本《底层》的上演也堪称

一绝。莫斯科艺术剧院派出了齐整的演员阵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办者，戏剧家聂米罗维奇·丹钦柯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担任首演式的导演。丹钦柯饰演沙金，契诃夫的夫人尼碧尔扮演娜思佳，高尔基的第二个妻子安德烈耶娃扮演娜达莎，名演员莫斯克文和卡恰耶夫分别扮演鲁卡和男爵。精湛的表演使新颖深刻的剧本取得了巨大的轰动，高尔基出场答谢达15次之多。

1903年1月，《底层》在国外的演出同样引起了轰动。到1905年5月5日，两年多的时间里，柏林克莱赖斯剧院演出《底层》竟已达到500场！

运用戏剧这一新的斗争工具取得的成功大大鼓舞了高尔基。1904年，他接着创作出了《避暑客》。11月，高尔基亲自出席了在彼得堡的科米沙尔热夫斯卡娅剧院进行的《避暑客》的首演。

到1904年的12月，高尔基决定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剧团，这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戏剧团体，将会更好地配合高尔基完成一些斗争的任务。然而，1905年1月9日在彼得堡发生的“流血星期日”惨案，阻止了这一切的进行。

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在战争中遭到惨败，显示了沙皇专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的工人们怀着向沙

皇寻求保护的愿望去冬宫游行，请愿书上写道：

“我们，彼得堡的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特来向沙皇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生活困苦，倍受压迫，担负繁重不堪的劳动，忍受着欺凌和种种非人的待遇……，我们再也不能忍耐……我们活到了可怕的时刻，宁死也不能继续忍受下去。……”

善良的工人们抬着沙皇的相片，举着教堂的旗帜，唱着祷告歌，带着请愿书向冬宫走去。

然而，沙皇派出了军队，枪杀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在这个“流血星期日”里，有1000多工人被击毙，2000多工人受伤。

这一天，高尔基就在流血事件发生的地方，他被大屠杀的场面所深深震惊，回到家后，立刻写了一份《告社会书》。

《告社会书》写道：“……我们不应容忍这种社会制度了，我们号召俄国公民要同专制主义制度进行刻不容缓、顽强的和同心协力的斗争。”

当晚，高尔基在自由经济学会会址发表了演说，组织了为1月9日受难者及其家属募捐的活动，还散发了自己署名的传单。第二天晚上，警察搜走了一份传单。

高尔基在里加被捕了。这一次，他被押到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关进了特鲁别茨克棱堡的最高

国事犯的单独禁闭室里。高尔基承认了自己是草拟传单的执笔者，并且个人承担了这一责任。

1905年的这一次被捕，轰动了全欧洲，因为高尔基这时已经成为一个全欧闻名的作家了。

德国报纸给俄国内务部长寄出了一封由269名德国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签名的信，要求释放高尔基。雕塑家罗丹、作家法朗士、白里安等也联名电慰高尔基。法国《人道报》收集了大量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的签名(有罗丹、法朗士等人的)抗议逮捕高尔基。美国舆论界对于俄国同日本作战及压迫本国人民的行为都极为反感，“流血星期日”惨案发生后，高尔基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美国许多报纸都参加了援助高尔基的活动。整个西欧舆论界为抗议高尔基被捕举行过一次示威举行。

沙皇政府只好再次让步。2月5号，他们允许高尔基在狱中写作。2月14号，在多付了一万卢布押金的条件下高尔基获释，当晚就回了里加，不过仍被宪兵严加监视。

10月份，在高尔基的大力协助下，《新生活报》创刊了。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合法的机关报。

下半年，高尔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2月，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在莫斯科组织武装起义。高尔基一直住在莫斯科，为起义者提供资金和机器。布尔什维

克莫斯科市委专门派遣了一支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来保护高尔基。一个反动组织试图加害高尔基，但最终没有得逞。

起义失败后，高尔基面临新的逮捕。在这种情况下，高尔基同意组织上的意见——到国外去。这样，他可以呼吁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募集基金。

这样，1906年2月，高尔基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异国他乡去了。高尔基一生的命运总是与“流浪”联系在一起。只不过，1906年开始的这次“流浪”，高尔基不再是一个“孤儿”，而是布尔什维克家庭中一员了。

当时芬兰并归俄国，是俄国的一个省。高尔基就由这里出发，经过瑞典，先到了德国。在德国，高尔基可是大有名气的人。1901年，在德国，发生了六家出版商同时争着出版高尔基文集的事情，当时在出版界曾轰动一时。1903年1月，《底层》在柏林上演，又取得过极大的反响。在1905年，德国报纸发出那封有269名德国名人签名要求释放高尔基的信时，高尔基已成了德国注目的焦点人物。这一次到柏林，德国人民欢迎他的程度可想而知。高尔基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高尔基不仅作为一个作家，而且作为

一个热情的宣传者、革命家留在了德国人民的记忆中。

接着，高尔基离开德国，经过瑞士和法国，最后到达了美国。在美国，是禁止无政府主义者入境的。刚开始，俄国大使馆想用这一法律来阻止高尔基入境。但因为很难把高尔基算做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这一阴谋没有得逞。在马克·吐温的帮助下，高尔基顺利进入了美国国境。

在纽约，满载着新闻记者的快艇离岸去迎接高尔基所乘的轮船。以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首的一家作家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盛宴。

高尔基举行了群众大会，为俄国革命募集资金。他不断引起俄国驻美大使馆的恐慌。

俄国驻美大使馆使出了新花招。他们收买了黄色报纸，诋毁高尔基。当时随同高尔基前往美国的安德烈耶娃是高尔基的第二个妻子。报纸声明说他俩关系是不合法的，因为没有经过教堂的“核准”。

这卑鄙的一招居然得手了。美国的大旅馆都纷纷拒绝让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娃居住。

然而许多人纷纷来信邀请高尔基去自己家里居住。马丁夫人(当时纽约一位著名医生的女儿)和马丁(一位英国教师)就是其中的两位。高尔基夫妇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在马丁夫妇的别墅里，高尔基写了剧本《敌人》

和长篇小说《母亲》的第一部。此外，写了政论集《我的会谈录》和《在美国》。

以民主自诩的美国最终没有容纳高尔基，半年的流亡之后，在1906年的秋天，高尔基夫妇离开了纽约这座被高尔基称作是“黄色魔鬼的城市”。

九、新颖的哲理剧——《底层》

我们知道,1902年,当高尔基创作了《底层》后,冲破沙皇政府的阻挠,在享有盛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么,这部戏剧到底有什么魅力,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呢?

让我们来从高尔基的第一部戏剧《小市民》开始考察吧。

《小市民》讲的是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一家的生活。

别斯谢苗诺夫是老一代小市民的典型。他愚昧无知、专横顽固、自私自利。他坚持现行的生活秩序,竭力维护腐朽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他害怕一切新生事物。

他的儿子彼得是个知识分子,彼得对家庭和社会都有所不满,曾因参加学潮而被学校开除。但他早就对自己的鲁莽行为后悔不迭。他追求的是无聊庸俗的安逸生活。最终他和旧制度、旧思想妥协了,和父亲也和解了。

塔季雅娜是别斯谢苗诺夫的女儿。她苦闷无聊,自杀未遂。最后也倾向和父亲妥协。

戏剧的真正冲突在别斯谢苗诺夫和养子尼尔之间

展开。尼尔是火车司机，他热情、乐观、朝气蓬勃。他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秩序必须改变，“不变的列车时刻表是没有的。”尼尔还意识到工人会成为生活的主人，因而他说：“谁劳动，谁就是主人。”他清醒地看到：权利不是给的，权利是争来的。他决心要闯进生活最深处，“把生活捏成这样，捏成那样。”他既反对老一代小市民的专横保守，也厌恶年青一代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他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作品中首次出现的革命无产者形象。

《小市民》是一份政治宣言书，观众对它的大胆暴露和批判，给予了强烈的回应。作为一个思想性很强的剧本，它取得了成功。但就艺术价值而言，《小市民》里几个人物都过于平面化，尤其是尼尔，作为戏剧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没有丰富性格的人。这一点严重地削弱了戏剧的艺术成就。

但《小市民》作为高尔基第一部戏剧却有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它使高尔基熟悉了戏剧的表现形式，为更好地掌握这一艺术形式做了探索。果然，不到一年的时间后，高尔基创作了真正成熟的，可以称得上是他的代表作的戏剧——《底层》。《底层》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流浪汉借以栖身的夜店中，居住着一群生

活在底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浪汉：锁匠克列士和他生命垂危的妻子安娜、小偷贝贝尔、妓女娜思佳、潦倒的男爵、沙金、戏子，还有唱匠、鞋匠等等。

克列士本来是个正直而勤劳的锁匠，开始时，他还有一个人的自豪感。他说：“我是工人，我要爬出去。”但妻子死后，为了埋葬她，他连仅有的工具也卖掉了。生活的折磨使他变得消沉和绝望了。

小偷贝贝尔受人歧视。但他性格坚强，心胸开阔。他虽然曾同内掌柜瓦西里莎姘居过，可是他发现了瓦西里莎是个贪财和没有心肝的女人，就断然拒绝与她来往。他痛恨目前这种生活，幻想着带着善良的姑娘娜达莎去过“自个儿能看重自个儿”的生活。

妓女娜思佳烦闷，空虚，但她对纯洁的爱情有着幻想，因而她经常捧着描写恋爱故事的小说《薄命缘》。

戏子得了酒精中毒症，整天被疾病折磨着，可是他天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浪漫主义者。

沙金年轻时是个很活跃的小伙子，比较有文化。他为了救妹妹打死了一个坏蛋，因此坐了四年多牢，出狱后走投无路，沦落底层。

众房客中，只有男爵的情况不同。他整天沉湎于自己早已失去的天堂，经常谈起他的过去：在朝为官，官居要职，有几百农奴，有钱，有马，有厨子等。

这些房客都受着夜店掌柜柯斯狄略夫的欺诈。柯

斯狄略夫是个残暴、伪善的吸血鬼。他在每个房客身上打主意,并且残酷地迫害、毒打妻子的妹妹娜达莎。内掌柜瓦西里莎比丈夫更残忍、更贪婪,难怪有人说她“坏得都没边儿了”。她与贝贝尔姘居过,但并不是真正地爱他。她看见贝贝尔真心喜欢自己的妹妹娜达莎,就一面毒打妹妹(甚至用开水烫她的脚);一面想同贝贝尔作一笔交易:如果贝贝尔能杀死柯斯狄略夫,让她去过更加放荡的生活,她就愿意成全贝贝尔和娜达莎的好事。

这天,瓦西里莎和柯斯狄略夫上坟去了,贝贝尔趁此机会坚决要求娜达莎跟他走。贝贝尔甚至向娜达莎保证不再偷窃了,娜塔莎有些不相信。这时,夜店夫妇俩回来了,他们毒打娜达莎。贝贝尔失手打死了柯斯狄略夫,夜店大乱。

最后贝贝尔被逮捕了,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去服苦刑。戏子也因又病又弱,上吊自杀了。

《底层》是高尔基对流浪汉生活将近20年来观察的艺术总结。他在《底层》中塑造了一个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通过他们的悲剧命运,控诉了沙皇统治下的社会的罪恶。

然而,作为一个革命作家,高尔基不满足于对黑暗社会作一般性的揭露和批判,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去探讨受苦受难的劳动者的出路问题。为此,他在剧中

安排了两个冲突的角色。

一个是游方僧鲁卡。他在第一幕中由娜塔莎领到夜店。他一到夜店就对房客们说：“对于老头儿来说哪儿暖，哪儿就是家。”他看清这些流浪汉的生活很苦，因而就以甜蜜的谎言来安慰人，散布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使人暂时忘却苦难。他安慰生病的安娜，要她快快乐乐去死，说：“死对我们就像母亲对于孩子们一样。”他又对戏子说，某地有一所免费治疗酒精中毒症的医院。他还安慰小偷贝贝尔离开夜店去西伯利亚的“黄金之国”。

剧中的流浪汉沙金尖锐地揭穿了鲁卡的安慰主义哲学的反动本质：“谁居心不良……或是靠榨取别人的血汗过活，谁就需要撒谎……有的人靠撒谎支持自己，还有人靠撒谎掩饰自己……谎话是奴才和主人的宗教，……真实才是自由人的上帝！”沙金和鲁卡是相对立的艺术形象。他尊重人、赞美人、维持人的尊严，相信人的力量。沙金大声疾呼：“一切在乎人，一切为了人！只有人，此外的一切都是他的手和头脑创造出来的！人！这个名字多么灿烂光辉啊！这个字叫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啊！人！一定要尊重人！不要怜悯他……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一定要尊重他！”沙金并不是革命者，但在特定的戏剧环境里，高尔基只能通过他的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期唤醒那些生

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激发他们变革现实的信心和力量，鼓舞他们追求真理，反对鄙俗，向着崇高的人生目标奋进。因为这段著名的台词，《底层》被人们称为“海燕式”的剧本。

《底层》充分体现了高尔基戏剧的艺术风格。它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不追求刺激强烈的舞台效果，而是采用朴实、凝炼的手法表现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日常生活，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它还通过符合性格特征的对话和饱含哲理的台词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政论性、哲理性。作者没有着重描写流浪汉的个人生活，却强调他们的社会特征。剧本的中心是流浪汉的集体群像及对他们的出路的探讨。

这是一部新颖的社会政治哲理剧。它有着以往的剧作家们从未采用过的主题和题材。它还大胆地让上层的人民群众登上了戏剧的舞台。

《底层》新颖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它跻身于万紫千红的西方戏剧之林，为群众所喜爱。

十、一本及时的书——《母亲》

在峥嵘岁月里，高尔基不仅创作出了《底层》这样有影响的戏剧作品，而且创作出了一部后来被评论界视为“高尔基的最重要的作品”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母亲》。

小说通过青年工人巴维尔及母亲尼洛夫娜献身革命的事迹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国内的革命斗争。

工厂像一头怪兽一样吞噬着工人的血汗。老钳工米哈伊奇·弗拉索夫是工厂里最好的钳工。但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得到的工钱总是很少。他精神十分苦闷，于是经常酗酒，还和人打架，回家后就拿妻子尼洛夫娜出气。弗拉索夫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母亲尼洛夫娜是个受尽生活折磨的人，长年累月的劳动和丈夫的毒打已把她折磨坏了，她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声响，整天带着哀愁和不安的神情。整个人显得柔顺又悲哀可怜。

父亲死后，儿子巴维尔也成了工人。刚开始，他也像父亲一样苦闷地喝酒、抽烟。但不久，巴维尔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拿书回家用功了，那些粗野的话也从他的谈吐中消失了。巴维尔告诉母亲，这是因为他看了一些禁书，明白了一些道理。巴维尔还谈到母亲

生活痛苦的原因，母亲暗自惊奇。

不久，巴维尔和少数青年工人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在母亲家里秘密组织了革命小组。

工厂里出现了他们秘密散发的传单。宪兵逮走了两个工人，母亲看到这一切，眼睛里涌出了无可奈何的眼泪。

不久，发生了“沼地戈比”事件。工厂周围有一片滋生蚊蝇的沼泽地。厂主借口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宣布从每一卢布工资中克扣一戈比做为排水的费用。巴维尔在自发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挺身而出，一方面积极支持和领导工人同厂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辩论；另一方面，他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但由于广大工人尚未觉醒，巴维尔也缺乏斗争经验，在演说时过多地讲道理。结果，厂主一出现，工人们马上惶惑地给他让路，还有人脱帽、行礼。斗争以失败结束。当晚，巴维尔被捕了。

“沼地戈比”斗争失败后，母亲目睹了警察搜捕革命者的野蛮暴行，既害怕又憎恨。但她终于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代替儿子去工厂散发传单。当然，她的行动主要是出于母爱，是为了营救自己的儿子。

沙皇抓不着巴维尔等人的把柄，只好把他们放出

来了。经过“沼地戈比”事件和狱中斗争，巴维尔逐渐成熟，工人群众日益觉醒。“五一”前夕，同志们决定举行游行活动。巴维尔不顾女友沙馨卡的劝阻，毅然担负起领导和指挥游行示威的重任。在游行示威过程中，巴维尔威风凛凛地高举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工人们像铁屑被磁石吸住一样，紧紧地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高呼口号，高唱战歌，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英勇搏斗。“五一”游行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野蛮镇压，巴维尔再次被捕。

母亲在游行过程中，始终与儿子在一起。她也同敌人进行了搏斗，儿子被捕后，她主动向周围的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表明她的革命意识已经觉醒，尼洛夫娜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开始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艰苦劳累，到工厂、农村去散发书报和传单，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执行秘密联络任务，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她的眼界开阔了，斗争经验丰富了，不再害怕敌人，也不再笃信上帝了。

巴维尔在被捕后遭到审讯，他把法庭变成了斗争的阵地。他大义凛然，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痛斥沙皇专制统治的暴行，宣布共产党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战斗纲领：“专制制度不是束缚我们国家的唯一锁链，它只是我们必须从人民身上最先打

碎的第一道锁链，现在我们要求获得足够的自由，使我们将来能夺取全部政权。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人民，全部政权归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巴维尔终于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巴维尔被判处了流放，母亲觉得十分难过。但是人们纷纷围过来安慰她。同志们把巴维尔的演讲稿印了出来。母亲主动要求去送发这些传单。但在车站候车时，她发现自己被严密盯梢了。她沉着镇定地将随身携带的传单向群众散发，然后再进行鼓动宣传，当军警残暴地抓住她时，她喊出了：“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灭不了的……”

巴维尔是在俄国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有血有肉的高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形象。尼洛夫娜由一名落后无知、温顺柔弱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勇敢、坚定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母亲》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情节，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了作品的主人公，这是世界文学中破天荒的大事。

高尔基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母亲》展示了俄国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规律，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小说中的巴维尔、尼洛夫娜等人的形象，既集中了20世纪初期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又熔铸着作家的浪漫

主义思想，具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母亲》的创作实践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成为极大地影响整个苏联文学的一种创作方式。

就以上两点来说，《母亲》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艺术丰碑。《母亲》在当时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更多的在于它具有的时代意义。

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而革命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很多群众和工人还没有觉醒。在当时，如果能写出歌颂工人的革命斗争，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坚信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作品，那将会促进人们的觉悟，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会使人们找到行动的榜样。细致、真实、典型地展示这一形象的成长过程，又会使人们比照自身，发现行动的道路。这样的作品将会有力地支持革命。所以，列宁对《母亲》的面世报以很大的热情，称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及时”的意义就是由此而来的。

今天看来，《母亲》在艺术上或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比如说：人物的性格不够丰富。在巴维尔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就整体艺术效果来看，《母亲》也稍为粗糙了些。但它巨大的时代意义、思想意义却使《母亲》最终仍然成为一本成功的书。正如卢耶察

尔斯所说的，这本著作成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案头必备书”。

1929年，夏衍把《母亲》译成了中文。它也同样激起了中国青年，为革命事业而不惜赴汤蹈火的热血。

十一、伟大的友谊——列宁与高尔基

1906年年底，高尔基由美国来到了意大利。

高尔基说过：“假如我不是一个俄国人，大概我宁愿做一个意大利人。”因为，意大利不仅给高尔基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环境，还孕育了一段伟大的友谊。

高尔基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前前后后共停留了15年之久。除了故乡下诺夫戈罗德以外，这里是他一生当中逗留得最久的地方。

他惊叹于这个国家的美丽。他多次说过：“意大利是欧洲大陆一个最美丽的国家。”绚丽的阳光，碧蓝的海洋，远处维苏威火山冒着烟，缭绕着淡紫色的云霭，海上漂浮着星星点点的渔舟，居民们的建筑依山而起，建筑前面是石滩，一级级向海中延伸。四处可以看见葡萄、蜜桔、柠檬、无花果的黑沉沉的叶子和橄榄树银灰色的叶子。它们都在显示地中海沿岸的美丽与富饶。这给他提供了优雅的创作环境。

他还惊叹这个国家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他更惊叹于这个国家人民的热情。到达那不勒斯的第一天晚上，高尔基去剧场看戏。序曲已经开始了，但因为他的到来，音乐骤然停止，大厅里的灯光都亮起来，观众们向高尔基欢呼，这时，军队改为演奏马赛曲，表示对

高尔基的光临的欢迎，剧院经理献上了鲜花。

三天以后，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欢迎会上，高尔基说：“我不懂你们的语言，你们也不懂我的话，但我了解你们的夙愿和希望，你们也同样了解我的夙愿和希望。”

无论走到哪里，高尔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以发表文章、写信、打电报表示自己的喜悦。高尔基，就像几十年前初到意大利的司汤达一样，把意大利看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高尔基居住在喀普里岛上，完成了《母亲》的创作。除此之外，从1906年—1913年，还写完了长篇小说《童年》和《没用人的一生》、《忏悔》、《夏天》、《奥吉洛夫镇》等6部中篇小说，《最后一代》、《怪人》、《瓦萨·日列兹诺娃》、《伪金币》、《崔可夫一家》等5个剧本、3个短篇小说和若干特写、论文。可以说，在喀普里岛上，高尔基的创作获得了丰收。

与此同时高尔基获得的是思想的丰收。这一丰收来自于高尔基与一位伟人——列宁的交往。

早在1900年，列宁创办《火星报》之后，有人就秘密地按期把《火星报》送交给高尔基。高尔基青年时就一直在思考的许多问题，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怎样才能找到一种新的生活，如何为了得到这

种生活而斗争，这些都在《火星报》上找到了明确的答案。《火星报》帮助高尔基选择了革命的方向，使他有了斗争的力量。就在这时，他开始接受列宁的思想。

1902年10月，高尔基同《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见面，声称完全同意《火星报》的观点，准备筹集资金，全力支持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

遗憾的是，由于警察的“特别监视”，高尔基一直没有跟列宁见面的机会。但是，从列宁的文章里，从跟随列宁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演说和工作中，高尔基感到了真正的革命性。所以，到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化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时候，高尔基就坚定地站在了列宁所在的布尔什维克这边。

列宁则更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作家。1899年，当高尔基在《生活》杂志的文艺栏工作时，列宁就曾称赞《生活》“是一个很不错的杂志，特别是小说栏，简直好极了。”高尔基的热情与才华打动了他。在《海燕之歌》发表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过：“谁读了这首诗，谁就会了解，为什么伊里奇那样热爱高尔基……”

1905年的6月，高尔基和列宁开始了通信，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11月27日，高尔基在彼得

堡党中央的会议上首次见到了列宁。但由于高尔基当时发着高烧，所以没有跟列宁过多地交谈。

1907年4月，正在意大利旅行的高尔基接到俄国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在4月30日到5月16日，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第2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是高尔基与列宁的第二次交往。这一次交往给高尔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是在伦敦郊外的一所简陋的木头修建的教堂里召开的。以列宁为首的孟什维克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之间，进行了热烈的辩论。高尔基坐在一个角落里。靠着一根柱子，一连几个钟头聚精会神地听着、看着。在后来的回忆录《列宁》里，高尔基描写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会议期间给他的印象。

“当我被‘引见’给普列汉诺夫的时候，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严厉地看着我，有点厌烦，好像一个教书教厌了的教师又看到了一个新学生一样。他向我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我很敬仰您的才能……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无论是他，还是我，谁都不想推心置腹地交谈。”但高尔基却这样回忆道：“列宁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那一双灵活的惊人的眼睛，立即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高尔基说出了他对列宁的主要印象：“这个人一切都太朴素了，在

他身上感觉不到丝毫‘领袖’的气派。”

接着，高尔基又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做了对比。普列汉诺夫“穿着礼服，扣上所有的纽扣，像一个新教牧师……他坚信他的意见是不可辩驳的，每一个字眼都是极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间的每一停顿，也是极有价值的。他很巧妙地向代表们头上的空气里播出流利又漂亮的语句。”列宁则“匆匆登上了讲台，用喉声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过了一分钟，我也像所有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他的演说的和谐、完整、明快和强劲，他站在讲台上整个形象——简直就像一件古典艺术作品：什么都有，然而没有丝毫多余，没有任何装饰……正如脸上的两只眼睛、手上的五个指头那样天生不可少似的。”

高尔基还对比了工人们对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评价。一个工人说，列宁最显著的特点，是“朴素，像真理一样朴素”。另一个工人则说：“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尊，是我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

1907年的党代会高尔基对列宁产生了深深地崇敬之情，他渴望走近列宁。这成为高尔基和列宁亲密交往的开始，从此他们建立了更友好的通讯联系。

列宁总是密切关切着高尔基的创作，当《母亲》发表后，他欣喜地称它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在1907年前后，高尔基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对国内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消沉和变节进行了抨击。这些文章，如《个人的毁灭》、《论犬儒主义》等得到了列宁的赞同。但渐渐地，特别是在1908年，因为复杂的斗争，他们的思想有了分歧。

1908年，高尔基向列宁发出了邀请。4月，列宁来到了喀普里岛，这是列宁第一次到意大利专程访问高尔基。

但这不是一次轻松的会面。因为高尔基的主要目的，是试图“调解”列宁与“召回派”的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矛盾。这三个知识分子，在1905年革命高潮中归附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失败后则陷入了修正主义，他们主张放弃公开和合法的斗争，召回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他们攻击唯物主义、宣传“寻神论”和“造神论”，想寻找和创造一种新的宗教，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而列宁坚决地对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并正在紧张地创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高尔基受了“召回派”的影响，也主张“造神论”。但他又敬佩、拥戴列宁，于是就力邀列宁前来，试图使他们和解。

列宁在意大利岛上逗留了六天，结果当然不可能产生和解。因为两人周围总是有许多人，他们一直没能充分地交换意见。而且列宁每天都是在与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激烈争辩中度过的，气氛不可能愉快得起来。两位朋友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

1908年，高尔基发表了《忏悔》这部小说，这说明了高尔基仍在坚持造神论的思想。列宁针对这部作品，给高尔基写了一封批评的信，但考虑到种种原因，列宁并没有寄出这封信。但从此以后，他们的通信中断了。

不久，在意大利喀普里岛上创办了一个党校。高尔基积极投入到创作工作中去，并在党校讲授《俄国文学史》课。但是这所学校其实是“召回派”为了网罗党羽而开的。不久高尔基就看到了这种派别之争，他忧心忡忡，不知出路在哪里，他让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米哈伊尔去巴黎，去寻找列宁的帮助，这一举动改善了他们的关系。

1909年11月，在会见了米哈伊尔的当天，列宁就给高尔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鼓励和帮助这位朋友。在这封信里，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党校的本质，并鼓励高尔基不要在困难面前被吓倒。从这时起，他们之间曾中断了一年半之久的通讯又恢复了。

这时，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出现了许多谣言，它们

涉及到列宁对高尔基的态度，宣称高尔基已被开除出党，列宁立即写了《资产阶级报纸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进行了反击，维护了高尔基。

1910年8月，列宁再一次应邀前往喀普里，这一次，是真正的友谊的呼唤。列宁难以掩盖他的欢乐心情。这一点从列宁给母亲写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他高兴地说：“我在那不勒斯衷心地向您问好。我是从马赛坐船到这儿来的，又便宜，又舒适。就像在伏尔加河上航行一样。我要从这里到喀普里去住几日。”

高尔基陪同列宁游览了喀普里岛上的古迹：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提庇留宫殿的遗址、14世纪岛上一位封建主建筑的修道院等等。高尔基讲解得极为生动。作为一名文学家，他善于用几句话就描述出一幅风景画，或是描述一件事或一个人。安德列耶娃回忆道：“他这一特点使列宁甚为钦佩……我觉得，正是从这时起，列宁亲切地爱上了高尔基。”到晚上，列宁倾听高尔基讲有关俄国和农村的故事。列宁发现这位朋友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羡慕地感叹说：“我对俄国知道得太少了。辛比尔斯克，喀山，彼得堡，流放地——几乎就没有别的了！”而高尔基，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相处，更加发现了列宁是“一个极好的同志，一个愉快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怀着强烈的无穷无尽的兴趣，对人们抱着异常温和的态度。”高尔基跟列

宁在南方晒烫了的喀普里石径上散步，欣赏金黄色的金雀花和渔人们的肮脏的孩子。”高尔基还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列宁：“他有一种磁力吸引着劳动人民的心灵和同情，他不会讲意大利语，但是曾经见过夏里亚宾和其他不少俄国著名人物的喀普里渔民，却出于某种本能，一下子就对列宁特别看待。他的笑是富有魅力的……老渔民乔凡尼·斯巴达洛谈到他说：‘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这样笑’。”

“在犹如晴空一般碧蓝而又澄清的水波上划船的时候，列宁学习用手指钓鱼——只用一根钓丝，不用钓竿。渔民们向他解释道：当手指觉得在晃动的时候，就一定是钓着鱼了。‘这样：叮铃—叮当。懂得吗？’

他立刻钓到了一条鱼，把鱼拉起，大叫起来，像小孩一样欢喜，像猎人一样兴奋。

‘哈哈！叮铃……叮铃……’

渔民们也像孩子一样快乐地哄笑起来，并且称呼这个渔人道：

‘叮铃—叮铃先生。’

‘叮铃—叮铃先生好吗？他不会被沙皇抓住吧，不会吧？’”

这两位朋友——一位文学家和一位革命家，在美丽的喀普里度过了许多这样的快乐时光。他们性情相投，相互的了解一天比一天深，友情也一天比一天浓，

他们互相向对方学习，并相互指出工作上的问题和提供自己的帮助。

高尔基把自己的种种创作计划告诉了列宁。高尔基向列宁讲了许多故事，谈到了自己的故乡，谈到他的童年和外祖母，谈到他的少年时代和流浪生活。列宁全神贯注地听着，他那双经常是眯缝着的眼睛闪闪发亮。列宁对高尔基说：“老兄，您应该把这些全部写下来！这一切很有教育意义，很有教育意义。”高尔基回答说：“到时候……我来写！”这段交谈促成了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诞生。

列宁认为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动笔。有一次，高尔基还向列宁谈起过关于《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创作计划：“我……幻想写一个家庭的百年史，从1813年莫斯科重建开始直到我们今天。这个家庭的祖先是农民，是一个由于在1812年立下战功而被地主解放的村长，从这个家庭出身的有官吏、神父、工厂主，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涅恰耶夫分子和70、80年代的社会活动家。”列宁非常注意地听着，提了些问题，随后说：“主题非常好，当然这是一个难处理的主题，需要大量的时间，我想，您是能够胜任的，不过我不知道，您将怎样结尾？现实生活还没有给它提供结尾。没有，这应当在革命以后写……”高尔基接受了列宁的劝告，将《阿尔达莫诺

夫家的事业》的写作推迟到革命胜利以后。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列宁还劝高尔基放弃他想写的历史题材，而指示他去写政治上急需的东西。列宁说：“……目前只能写类似的《母亲》那样的东西。”列宁是一个具有敏锐艺术鉴赏力的人。这使高尔基在与他交往时受益匪浅，列宁的许多意见和建议直接影响了高尔基以后的创作。列宁不但成为高尔基在思想上的朋友和导师，也成为高尔基在创作上的朋友和导师。列宁的帮助，使高尔基的创作热情高涨起来。从1910年到1913年高尔基离开意大利，短短三年内，他完成了《夏天》、《奥古洛夫镇》、《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童年》以及剧本《瓦萨·日烈兹诺娃》、《怪人》、《崔可夫一家》等。

在这些剧本当中，《夏天》表现了俄国农村的觉醒。小说写的是职业革命家叶果尔·特罗菲莫夫到农村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最后叶果尔·特罗菲莫夫被捕了，但全书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篇小说被称作是《母亲》的姊妹篇。

这当中，根据列宁的指示，高尔基写出了不少有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作品。它们包括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和长篇小说《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

它们是为1905年革命失败总结经验教训的作品。

《奥古洛夫镇》展示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小市民世界。1905年,革命事件波及到奥古洛夫镇,引起了骚动。在气势汹汹的小市民瓦维拉·布尔米斯特罗夫看来,“自由”与无赖行为是毫无二致的。土里土气的马亚金一家人和富裕的小市民库鲁古罗夫、巴祖诺夫等唆使布尔米斯特罗夫来安定这个骚乱的镇子,以大血战来结束骚乱。

在小说中深刻揭露的顽固、保守、落后的因循守旧的小市民习气后来被称为“奥古洛夫精神”。

《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则选取了小市民世界中的两个人物——玛特维跟他父亲的活动,展示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1905年革命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停滞生活,也写到了1905年革命打破了这些死气沉沉的局面。高尔基还想写一部《崇高的爱》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但没能完成。

在这些作品当中,有一部作品曾引起了列宁特别热烈的反应,列宁称它是“革命的传单”。这就是1911年—1913年创作的《意大利童话》。

打开书的第一页是一句卷首题辞:“没有一种童话,能比生活本身所创造的更美。”这是安徒生的名言,也是高尔基写作《意大利童话》的指导思想。

《意大利童话》由27篇故事组成,严格讲起来,

它们不算纯粹的童话，故事情节性不是很强，它写的是意大利的自然景色、人物和生活，从古代传说、乡土风情，一直到里巷琐事。

《意大利童话》中较有名的是第9、11则。它们的主人公都是母亲。第9则童话叙述一位母亲历尽艰难险阻去找侵略者铁木儿，要求把孩子还给她。铁木儿终于为她所感动，答应为她找到孩子。第11则童话描写的是一个大义灭亲的母亲。她的儿子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全城人民，成了围攻这座城市的敌人的首领。城市被围困，弹尽粮绝，全城人民都面临着死亡。母亲受到了全城人的敌视和唾弃，她十分痛苦，让守城人放她出城去见儿子。母亲在见到儿子后亲手用匕首刺死了他，然后也自杀而死。

高尔基在这几个童话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对母爱的讴歌。

第9则童话的开篇已成为一句名言：“让我们来歌颂母亲的妇女，因为母亲是不可战胜的生命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意大利童话》曾被誉为“用阳光、鲜花、爱情和意大利上空那一小块光彩夺目而又异常灼热的太阳编织成的小小的诗篇。”

高尔基再一次充分显示了他真实地描述的能力，他描述了意大利人民的全部生活：赤贫、穷困、苦难

和英勇。但这一切都是在意大利美妙大自然的迷人背景下发生的，洋溢着对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的浪漫主义的歌颂。

在创作《意大利童话》以后，在1912年—1917年，高尔基还写了一组《俄罗斯童话》。在这组童话中，高尔基大量采用讽刺的手法，鞭答了俄国文艺方面的丑陋现象。

是美丽、热情的意大利给予了高尔基创作的灵感，是列宁的崇高友谊使高尔基的创作保持昂扬的激情。

在1913年3月，为了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俄国宣布大赦。列宁立即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好像文学家全都获得了大赦。您应当试试回国一趟…对革命的作家来说，能到俄国(新的俄国)走一趟，以后，可能给罗曼诺夫王朝以百倍的打击。”

当时，彼得堡的工人们也发表了《致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公开信》，召唤高尔基返回祖国。

于是，1913年12月末，高尔基回到了阔别7年之久的祖国，定居在离彼得堡不远的芬兰村庄里。

具有戏剧性的是，高尔基已经到了彼得堡，才被几个偶然而来的暗探在火车站上认了出来。这件事使得警察局大为丢丑，他们只好质问边防宪兵：“像阿列克赛·彼什科夫这样著名的革命活动家进入帝国边

境，你们是否打报告？什么时候打的？打给了谁？”

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庆祝会来欢迎这位人民的作家，欢迎的函电像汹涌的洪流滚滚而来。

1914年，高尔基与青年作家们开始了广泛的接触。3—4月间，他与《无产阶级作家文集》第一集的作者们见了面。第一集由高尔基主编并作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这时爆发了。高尔基反对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但他在当时同许多人一样，错误地认为整个德意志民族是这次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在这样的一份宣言上签了名。但他很快就认识了这种错误。

这段时间，他同列宁的联系是通过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进行的。两位朋友通过书信进行了广泛交流。但是，在这个俄国历史不断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里，高尔基再度地走上了弯路。

在1917—1918年，高尔基担任《新生活报》的编辑和政治家。受周围知识分子的影响，他对形势产生了错误估计，对列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方针产生了怀疑，高尔基否定十月武装起义的必要性，还呼吁革命者要尽快地与沙皇政府缔结和约。列宁在报上看到了高尔基的“呼吁”后，十分生气。在这政治斗争极其尖锐的关键时刻，高尔基的呼吁等于帮助了敌人。列宁愤怒地批评了高尔基。

然而，列宁的当头棒喝还是没有使高尔基分清生活的主流。许多被吓破了胆的知识分子纷纷来找高尔基，向他发牢骚，谈论革命后的盗窃、抢劫、贿赂、投机倒把。高尔基把这些现象都归咎于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并为此写了文章，登在《新生活报》上。

这个时候，列宁制订了关于抢劫者和投机倒把者的法令，在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都提出了应当坚决惩办投机商人和抢劫犯。列宁用大量铁的手腕同落后阶层的无政府状态进行了特别顽强的斗争。

遗憾的是，高尔基没有看到这些。为了帮助高尔基，许许多多的人纷纷给高尔基去信；或去拜访他，希望他回到苏维埃政权来。

列宁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了高尔基，但并没有就此抛弃他。列宁相信高尔基是不会离开革命的队伍的。高尔基的错误也只可能是暂时的。因为，高尔基来自“底层”，是人民的儿子，他必定会回到人民这边来。列宁一直在克里姆林宫等待着高尔基。然而，列宁的等待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

1918年3月，列宁被刺客刺伤了。刺客卡普兰，是个对革命心怀仇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尔基听到消息以后，十分难过。在愤怒之余，他深受震动。他意识到自己美化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识到

自己不赞成镇压反革命的错误。高尔基幡然醒悟了。列宁被刺的第三天，高尔基就给他拍去了慰问电。接着，高尔基亲自前往克里姆林宫，去看望列宁，并向他认错。两个朋友终于再度坐到一起，倾心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高尔基抛弃了自己愚蠢的政见，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来。

这个消息传出去后，许许多多的人们给高尔基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祝贺他迷途知返，更为他回到了列宁的身边而高兴。人民的态度使高尔基再一次反省自己的思想。列宁则趁此机会对他进一步提出坦率的批评和诚恳的劝告。

列宁从高尔基的来信和谈话里看出，高尔基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声势，相反，对周围事物却有着许多错误的印象。高尔基如果继续留在彼得格勒，埋头于保护文物和文化建设的话，那么，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高尔基都会看不到的。于是列宁建议高尔基去伏尔加河旅行，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否则生活会使高尔基“完全厌倦”。

高尔基并不肯离开彼得格勒，但他常常去新首都莫斯科去看望列宁，去接受列宁的教诲。而每逢高尔基去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列宁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的

心情总是格外愉快,这种愉快是被列宁那种特别急切、特别兴奋的情绪感染的。列宁与高尔基总是在一起商谈许多文化建设的问题,其中比较重大的成就是《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建立。高尔基成功地团结了近百名西欧文学的翻译家和近50名东方学者,出版了欧美和东方各国的译著。高尔基和列宁都重视研究东方问题和思想。在出版目录中也包括了中国文学作品。1922年出版了阿列克塞耶夫院士翻译的《聊斋志异》第一卷《狐媚》,1923年出版了第二卷《妖僧》,这是苏联读者第一次有机会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高尔基还提议成立专门研究东方问题的高等学校,同样得到了列宁的赞同。高尔基和列宁一起,为建设新的俄罗斯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辛苦的工作,使高尔基得了严重的肺病。1921年10月,在列宁一再敦促下,高尔基才离开祖国,去德国治病。高尔基没有想到,他这一去,竟是再也看不到列宁了。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他在一生中的最后几天,还在听人读《我的大学》(那时它刚出版不久)。此外,据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在弥留之际,列宁让她给他读了一篇文章,那是高尔基发表在1920年7月第12期《共产国际》上的文章——《符拉吉米尔·伊里奇·列宁》。列宁一边听着,

一边回想着他的一生。他的眼睛望着窗外，想念着高尔基。

列宁逝世后，万分悲痛的高尔基给列宁敬献了花圈。在花圈上，只简单地写着：“永别了，朋友！”然而，正是这朴素的一句话，包含着多少难忘的回忆和多少深情的呼唤啊。

高尔基立即着手写关于列宁的回忆录，并且很快就脱稿了。但是，他对这篇回忆录不是很满意，1930年，他再次动笔。1930年6月，改写完成。这就是广为传诵的《列宁》。

斯蒂芬·茨威格曾经对高尔基说过：“在全部当代文学里，我不知道有任何作品可与您描绘的列宁和托尔斯泰的肖像并驾齐驱，这是惟妙惟肖的两幅肖像，唯有它们将留芳千古。”

在《列宁》里，高尔基倾注了他的全部崇敬与热情。

高尔基记叙了列宁在伦敦、在巴黎、在喀普里的岁月，也记叙了十月革命列宁 与自己的交往。“一切都是真实的。您的回忆录中每一句话都会使人想起许多类似的话来。”克鲁普斯卡娅这样评价道。而高尔基不时的抒情插笔，把自己对列宁的怀念与热爱完美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也让崇敬与激情冲击着每一位读者。正是这种真实性和感染力，使《列宁》成为世界

文学中的名篇。

高尔基 与列宁 近 20 年的交往是一段伟大的友谊。他们都怀着对真理的无限崇尚，积极地投身于自己的事业当中。在他们漫长的友情中，他们不是没有出现过思想的分歧，而且甚为严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最终仍然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列宁对高尔基，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体贴入微的朋友。回想起列宁曾经的帮助，高尔基的心中就充满着感激与怀念。

高尔基把这种思想感情化为工作的动力，以百倍的热情投入了生活和创作。1925 年，高尔基完成了列宁的遗愿，写出了酝酿已久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十二、将倾的大厦——《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以旧俄罗斯的德廖莫夫城为背景，描写了阿尔达莫诺夫家三代人的命运，从而折射出俄国19世纪后半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从经济、精神等诸方面探讨了俄国资产阶级发展的规律。作家以暗含讽刺的笔触，反映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深入揭示了几代资产阶级的精神特征。小说因而成为一部气势恢宏的史诗性作品。

阿尔达莫诺夫家族的第一代老伊里亚是家族事业的开创者。他原来是地主家的田庄主管，农奴解放的时候，脱离了地主，得到了一笔酬劳金。伊里亚来到德廖莫夫城，他决意创办自己的事业，开一个麻布厂。伊里亚买下土地，接着，为了取得政治上的庇护，他去找市长联姻。怯弱的市长被伊里亚咄咄逼人的声势惊吓而死。伊里亚趁机占有了漂亮的寡妇——市长太太乌里扬娜。

伊里亚很快就给大儿子彼得娶来了乌里扬娜的女儿纳塔利娅。然后，伊里亚精力充沛地开始了创业活动。他亲自参加建厂房的劳动，不料在搬运锅炉的时候用力过猛，血管破裂，突然死掉了。他死在事业正

飞速发展的时候。

长子彼得勉为其难地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彼得是个无能的人。他把父亲创下的事业看作是对自己的束缚。他心底一直幻想着回到农村里，去过闲适的庄园生活。

次子尼基塔是个驼子。他对事业也没有兴趣。他的能力只限于做些整理花园之类的工作。自从彼得娶回纳塔利娅之后，他就偷偷地爱上了她。但他自惭形秽，不敢向纳塔利娅表白。终于有一天，他忍受不了了，上吊自杀。彼得和家中的扫院人吉洪把他救了下来。后来，尼基塔自愿去了修道院。

小儿子阿列克谢是伊里亚过继的侄儿。他较为灵巧，但风流倜傥，不务正当，沉溺于声色犬马当中。

第二代人只是维持着事业的发展而已。

纳塔利娅为阿尔达莫诺夫家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阿列克谢后来也有了儿子米龙。彼得的小儿子亚科甫是个典型的寄生虫。他肥胖如猪，什么也不懂，就对吃饭和女人感兴趣。米龙的志愿则是在国会里谋个议员的职位。

彼得的大儿子伊里亚是这个家族里与众不同的一员。他很聪明，爱好思考。他看到了工人们为他们家的事业被榨干了血汗。伊里亚看不惯父辈的生活态度，跟父亲发生了争吵。彼得一气之下赶走了儿子。伊里亚就此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家里人知道了他在外

面从事的是领导工人暴动的工作。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吞噬了许多工人。工人们开始四处暴动，反抗自己不公平的命运，反抗厂主和老板们的剥削。暴动发展为革命，最后，革命胜利了。亚科甫在十月革命的风暴中从家里逃出来，在火车上被人痛打了一顿，给像废物一样扔到车厢外面去了。没两天，他就死了。阿列克谢和米龙这个议员都没能给沙皇保住统治。

小说的结尾，彼得跟老工人吉洪相遇了。吉洪这个跟随了他们家族三代的老人，列数了三代人的罪恶，控诉了他们残酷的剥削和迫害。彼得早被赶出了工厂，被革命的风暴吓得神志不清，最后落得个靠妻子乞食的可怜下场。阿尔达莫诺夫家长达半个世纪的“事业”，就此烟消云散。

阿尔达莫诺夫家族的总趋势是一代不如一代，走着一一条逐渐没落直至灭亡的道路。他们的精神历程，由第一代的狂热追求，转为末代的行尸走肉。没落是这个家族的总体特征，也是这一家族的事业的发展趋势。尽管第一代人疯狂开拓，第二代人却只能维持事业的发展，第三代人葬送了事业。

阿尔达莫诺夫家族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所以，在《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中描绘的家族的命运，也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命运和整个资产阶级的事业的

命运。

与阿尔达莫诺夫家的命运平行的，是工人莫洛佐夫一家三代的历史。他们是通过侧面的叙述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上升的家庭。他们一代胜过一代，由被老伊里亚剥削的工人变成了工厂的所有者。

两条线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即在历史的进程中，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家最后成为事业的主人。

这个历史进程是包括着许多深刻的内涵的。在对整个阿尔达莫诺夫家族进行严峻审视的时候，高尔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一点，我们可以先从对老伊里亚这个形象的塑造上看得出来。

老伊里亚是一个资产者，他为建立自己的事业而残害了许多人，在发展事业的时候，有着残酷剥削工人的一面。高尔基后来借吉洪的口揭露、控诉了他的罪恶。但同时，高尔基给了老伊里亚以一定的肯定。高尔基看到，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伊里亚始终保持了进取精神。他对建立自己的事业王国充满了热情。他认为自己原来的农奴生活是“不敢依照自己的心意办事”的生活，这种“没有责任”的生活，他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农奴解放后，他清醒地看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时代已经来临。他对儿子们说，这是“大家都得显一显身手”的时代，“贵族已经注定完蛋了”，现

在“自己就是贵族”，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和保护人”。他教训儿子们说：“我们的事业应该跟士兵一样的步子前进。你们，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孙子都有充分的工作可做，足够做300年的。我国工业的伟大成就就应当由我们阿尔达莫诺夫家做出来。”高尔基丝毫没有忽视这个新兴资产者意志坚强、渴望做生活的主人的一面，没有忽视了他是一个意识到自己当前和未来的力量的先驱者。

高尔基不但看到了伊里亚的雄心，还看到了他的大略、他的魄力。伊里亚是从封建时代转变而来的。但他已经否决了自己身份的卑贱。他敢找上贵族的门去，光明正当地要求给儿子娶一个贵族的儿媳妇；他自己也大胆占有了一位贵族妇女。作为新兴的资产者，他的魄力更多更显著地体现在建设厂房时，在厂房建设基地，我们俨然看见了一位杰出的工业组织家。他亲自选定厂址、丈量土地、招募工人。他以百倍的信心投入到事业的基建和策划工作中去。为鼓舞工人的干劲，他前往监工，并亲自加入到劳动的行列中去。

老伊里亚是一个来自农民的杰出人物，罗曼·罗兰就曾经说过，高尔基创造的老伊里亚的形象是“不朽的”。高尔基对老伊里亚的外貌的描写，也是为表现伊里亚的精神服务的。作家极具功力地写道：“这个人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长一把颜色十分花白的卷毛

大胡子，生一头密密层层、髹曲得跟茨冈人一样的淡黑色头发，鼻子很大，灰色而又发蓝的眼睛在竖起来的浓眉下面放肆地向外张望；当他放下胳膊的时候，可以看出他那一双大手掌碰到了膝头。”高尔基把他塑造得粗鲁强健，这正是和他身上蕴含的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相符合的。

彼得则是作家着力讽刺、批判的一个对象。他小时候过惯了农村里的闲适日子，长大后，每当遇到什么困难，脑袋里都会闪一下回去农村再去过舒适日子的念头。可以说，他是一个没有雄心、也没有进取精神的资产者。他的能力跟他所担负的事业也是不相称的。他没有才干处理好工厂里各种棘手的事儿。他认为“事业就是人的主人”，事业对他来讲，是一种束缚，而不是一片可以放手大干的天地。他的弟弟阿列克谢和侄儿米龙都看不起他，他们在商量工厂的事务的时候，就当他不存在似的。彼得甚至没有能力对待生活。他整天陷入忧愁苦闷当中，最后浪荡起来。老伊里亚占有乌里扬娜还有一种向社会上层挑战的勇气在里面，彼得连对自己喜欢的女人波波娃表白的胆量都没有，却乐于沉溺在无耻的肉欲的堕落当中。彼得甚至也没有教育自己儿子的能力。小伊里亚质问父亲对工人的剥削，彼得竟然连为自己辩解的话都找不出来，更别说回答儿子的质问了，最后只好把小伊里亚

关起来以示惩罚了事。彼得做父亲的尊严就这样丧失殆尽了。

彼得身上明显地表现了第二代资产者的无能与没落。

彼得的弟弟尼基塔也是一个废物。肉体的残疾似乎暗示了他精神上的不健全。他病态地爱上了哥哥的妻子，长期地压抑使他的个性更为萎缩，最后躲进了修道院，成为自生自灭、无声无息的一个人物。

彼得的另一个弟弟阿列克谢倒也比他们俩都积极和精明得多。他和儿子米龙都是一类人，他们力图用不切实际的欧化改革和自由主义的空谈来巩固沙皇的统治，从而也巩固自己家族的事业。他们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的代表。但他们的行动是软弱无力的，当革命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显得那么可怜，终将归于徒劳。在历史的大潮中，他们只是两个可怜的叫嚣者。

阿尔达莫诺夫家族的第三代更是不值得一提。亚科甫的形象接近于一个脑满肠肥的白痴。连彼得都对他嗤之以鼻。阿尔达莫诺夫家族的人由于精神的苦闷、空虚，最后几乎无一都陷入到荒唐的婚姻和疯狂的肉欲当中。

高尔基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精神痼疾，说明了“事业”的崩溃不但来源于外部的力量，也根源于

内部的趋亡。与此同时，高尔基不忘对出生于剥削阶段家庭的人指明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通过小伊里亚铺展开来的。小伊里亚在发现了家族的罪恶时，毅然背叛了家庭并且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来拯救自己。和高尔基在《福马·高捷耶夫》当中塑造的福马的形象相比，小伊里亚的形象向前大大地迈出了一步。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不但因为思想的深度，同时也因为艺术上极高的成就，成为一部名著。他的艺术性首先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高尔基克服了在以前的创作中出现的人物性格单一化、平面化的弊病，塑造出了许多虎虎有生气的形象。其中最成功的要算对老伊里亚的塑造。曾有评论家说：“老伊里亚的形象……使人拍案叫绝……当我读着这个形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个子长高了，肩膀也变宽了……我认为，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对人的这种感染力决定着一切，不喜爱这本书是不行的。”

其次，作品有鲜明的主题，无论是情节、人物、结构都为清晰、深刻地表达这个主题服务。可圈可点的是：高尔基设置了明暗两条对立的线索，除此之外，《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塑造了一个特殊角色吉洪·符亚洛夫。在作品的大多数篇幅中，他都是作为一个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角色即目击者。但到最后，却成为一个令人震撼的人物。他淋漓尽致的控诉使主

题得以进一步明朗化。

此外，小说的叙事风格颇具特色。高尔基微带嘲讽的口气贯穿全书始终。全书还出现了许多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如前面提到的驼子尼基达，肉体的残疾暗示了心理的不健全。在老伊里亚死时，呆子安东努西卡唱道：“马车掉了一个轮子”，暗示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崩溃的开始。

从《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不难看出，高尔基在艺术上有了一定的追求与更大的成就。高尔基把自己的艺术之根扎在坚定的信念、深刻的主题当中。高屋建瓴的气魄、强烈的批判精神、鲜明的时代感，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反映资产阶级的“事业”——将倾的大厦的巨著。

十三、新“雅斯纳亚·波良纳”

雅斯纳亚·波良纳是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乡。托尔斯泰的创作被认为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在他从事创作的年代，没有一位欧洲作家能够同他并肩媲美。人们都很热爱与尊敬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因此，从四面八方赶来拜访他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他的家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就成了文学家们聚会的中心。

几十年后，在高尔基的身边也出现过这样的盛况。

1921年，高尔基离开德国，途经捷克、奥地利，于1924年回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定居在海湾南端的索仑托。从此，索仑托成为文学家源源不断光临的地方。意大利一家报刊在1928年纪念高尔基的寿辰时写道：“对于俄国作家来说，索仑托成了今日新的雅斯纳亚·波良纳……”

其实，在定居索仑托之前，高尔基与许多文学巨匠都有着亲密、长久的交往。早在1900年1月，高尔基就结识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认为高尔基是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人”，是一个给文学带来新天地的人。高尔基发现并反映了流浪汉的生活，正像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并描写了犯罪者一样。对于这一

点，托尔斯泰非常欣赏。

高尔基对托尔斯泰则是十分尊敬、十分景仰的。高尔基认为：“不了解托尔斯泰，就不能认为自己了解俄国，不能认为自己是个文明人。”他还说：“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是人类为自己树立的三座丰碑。”高尔基曾经写信给契诃夫，把自己会见托尔斯泰的情况告诉了他。高尔基在信中特别强调了托尔斯泰的质朴与深刻。尽管高尔基不能同意托尔斯泰的全部意见，但还是认为他说得极好、独特有力；同托尔斯泰的见面是愉快的，有教益的。高尔基在另一封信里对契诃夫谈了他在听托尔斯泰向他叙述《谢尔该神父》内容时的感受：“我听着他讲，被他叙述的美、单纯和他的思想惊呆了，我看着这位老人，他简直像一个瀑布，像大自然里的巨人，这个人真是惊人的伟大，他的精神的活力使人吃惊，并使你吃惊地想：存在这样的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不过高尔基对托尔斯泰并不是盲目崇拜，在原则问题上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尽管高尔基很赞赏托尔斯泰对专制暴政和教会的揭露批判，但他不能同意托尔斯泰的宗教说教，不能同意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学说。

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两种社会力量的代言人。他们的观点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一方面，高尔基不可能对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妥协；另一方面，托尔斯泰

对高尔基所代表的那个阶段的历史使命也是认识不到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很亲密，尽管彼此都很尊重对方。托尔斯泰对高尔基身上的那种“反叛性”是不可能欣赏的，由此使他产生了对高尔基的一些作品的保留态度。这其中有一些确实是由于艺术鉴别的差异，也有一些由于思想内容的原因。高尔基则一直对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忍耐和驯服的倡导者”抱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没有比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更侮辱人的口号了。

然而，作为两位心胸都很宽阔的作家，这些思想的分歧并没有阻止他们之间的互相扶持。1901年4月，高尔基因发表《海燕之歌》和参加革命活动而遭宪兵逮捕。托尔斯泰得知后，便写信给内政部，要求释放高尔基。同时还写信给奥尔登堡亲王，请他帮助此事。高尔基后来能够被释放出狱，很大原因是因为托尔斯泰的帮助。

1910年，托尔斯泰逝世的时候，高尔基拍去了电报，对这位文学巨匠的逝世表示了沉痛的哀悼。高尔基后来撰写了托尔斯泰的回忆录。关于这部回忆录，列宁认为“恐怕谁也不曾写得这样真挚，这样大胆。”茨威格也曾说，“在为列夫·托尔斯泰绘制的上万幅肖像中，在托尔斯泰的友人和来访者写的上万篇报道中，没有一篇能像马克西姆·高尔基简短的6

0 页‘回忆录’那样描绘出这位文学大师的精神、气质，而且描绘得那样清晰、生动和透彻。”

在高尔基创作的前期，另一位作家跟他结下了更为深厚的友谊。这位作家就是契诃夫。契诃夫为人谦逊，谨慎寡言，是个极好的人。1898年，高尔基把他的两卷集寄给了契诃夫，并开始同他通讯。契诃夫认为高尔基确实有才气，而且是真正的、巨大的天才。例如：《草原上》这篇作品就表现出非凡的天才。他甚至对高尔基说：“这篇作品不是我写的，我甚至有点妒忌。您是艺术家，您有敏锐的感觉。您善于雕塑造型，这就是说，当您描写事物的时候，您是看得见它和用手摸得着的。这是真正的艺术。”契诃夫屡次劝高尔基离开故乡去莫斯科或彼得堡居住，认为这对于他的创作活动会更为有益。1899年3月，高尔基去雅尔塔养病时，同契诃夫见了面。同年，他听从契诃夫的建议去了彼得堡。

高尔基在1900年前后，走上了戏剧的舞台，这也和契诃夫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首先，在1900年，高尔基通过契诃夫的介绍，认识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领导人。那个时候，这家剧院以成功地演出契诃夫的剧本而闻名。更为关键的是，契诃夫鼓励高尔基写作了第一个剧本《小市民》。当高尔基写出了《底层》后，契诃夫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热情洋溢地

说：“剧本新颖而且无疑十分优美。第二幕很好，这是全剧中最好最有力的一幕，我读到这一幕，尤其读到最末一段的时候，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了。”

高尔基和契诃夫成为极为亲密的好友。高尔基认为契诃夫“是一个巨大的独特的天才、一个在文学史上和社会风尚上划时代的作家。”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04年契诃夫逝世。

无论是初入文坛时柯罗连科的指引，还是托尔斯泰的长谈、契诃夫的热心相助，都被高尔基牢牢记住。他明白一个道理：在初学者进行紧张的探索的时候，如果完全得不到支持和援助，那么，就算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也可能湮没无闻。相反，却可能造就出作家。所以，当高尔基成为一个享誉文坛的作家后，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帮助、指导青年作家们的创作。

1915年2月，高尔基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相识。当年夏天，马雅可夫斯基专程去拜访高尔基，对高尔基朗诵了自己的诗作《穿裤子的云》。高尔基听完后欣喜异常，高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后来据马雅可夫斯基回忆，高尔基激动地流出眼泪，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坎肩都浸湿了。后来，当高尔基主办《纪事》杂志时，他吸收了马雅可夫斯基参加杂志的编辑工作。当资产阶级报刊对马雅可夫斯基展开铺天盖地的恶毒攻击时，高尔基领导的《帆》出版社，出

版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第一部大部头诗集，以此维护了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才华横溢，但对很多老作家都不怎么尊敬，只有对高尔基是例外。他曾经诚恳地在自己的诗集上题上话，敬献给高尔基。在索仑托的时候，高尔基如同十月革命前夕对待马雅可夫斯基那样，一如既往地从事爱护和帮助作家的的工作。

1925年，《恰巴耶夫》和《叛乱》的作者富尔曼诺夫，在作品发表后，听到的全是赞扬的声音。这时，他收到了高尔基的一封来信。高尔基的信中写道：“……两部作品的艺术价值都不太高。……您写得匆忙，写得十分草率，您像一个目击者在讲述，而不像一个艺术家在描绘……您是能够和应该写得更好的。为了这个，您首先一定不要相信廉价的赞许，不要迷醉于成功，您不应该把这种成功归于自己的才能，而应该归功于素材的重要意义，您实际上把这些素材处理得并不好……”富尔曼诺夫在收到这封信时则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立即给高尔基写了一封回信。但这位有显著才华的富尔曼诺夫却在一年以后不幸逝世。他的妻子在他逝世后，根据遗嘱，把他的最后的一部特写集《海岸》寄给了高尔基，并且不忘诚恳地向高尔基询问从中是否看到了富尔曼诺夫的进步。高尔基给予了她肯定的答

复和衷心的慰问。

高尔基一直热心地从事文化保护的事业。这保护不但包括对文化遗产，也包括对文化人的关怀。高尔基一直坚决反对粗暴地对待作家。1926年，当作家巴尼尔发表了小说集《骑兵团》后，遭致了骑兵第一军团总指挥、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布琼尼的痛骂(他认为巴尼尔歪曲了士兵的形象。)高尔基却认为巴尼尔写得出色而真实，于是无畏地与布琼尼展开了论战。高尔基虽然远在意大利，却成为作家们最贴心的人。

但高尔基从未以权威自居，他虚怀若谷，甚至主动向青年作家征求意见。1926年，在《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出版后，他给费定寄去了作品，请他指正。费定不客气地指出结构上的毛病。高尔基虚心地接受了，写来了诚挚的感谢信。

在索仑托，高尔基主要是靠信件与俄罗斯的作家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其中包括马卡连柯、革拉特珂夫、富尔曼诺夫、列昂诺夫、费定等等。而更多的作家更渴望亲自与高尔基交谈，接受他的教诲。他们从各地纷纷来到索仑托。来访问过的作家有列昂诺夫、巴别尔、革拉特珂夫、福尔什、阿·托尔斯泰、马尔夏克、剧作家阿菲诺盖诺夫等人。新“雅斯那亚·波良纳”——索仑托一时成为文学家充盈之地。然

而，这种生活曾被不愉快地打断过一次。

1925年，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已在意大利尘嚣直上。他们加紧迫害各种民主力量。在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一件极为恶劣的事。意大利的警察趁高尔基外出时，搜查了他的家。高尔基立即给墨索里尼发了抗议信。这一事件引起了意大利人极大的愤慨。因为高尔基是他们“伟大的客人”，他们热爱着他的思想，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贯为意大利人所深深敬佩。墨索里尼不得不有所收敛。最后这件事以墨索里尼大失脸面地向苏联大使做出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的保证做为了结。

旅居索伦托的时期，高尔基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在这美丽的“第二故乡”，他的健康得到了保持。他在完成长篇《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以后，紧接着又动笔写另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它们为高尔基赢得了更大的声望。

然而，到了1928年，高尔基实在太想念日新月异变化着的祖国了，依靠通讯了解到的国内的状况已经满足不了这位老人了，他想回国看一看。正当这个时候，国内庆祝高尔基60诞辰和文学活动35周年的活动广泛开展起来了。国内的朋友和人民都盼望见到这位离乡别井已达8年之久的作家。于是高尔基于1928年5月28日回到了莫斯科。

但由于健康原因,高尔基不得不很快返回索伦托。就这样,从1928年到1932年,高尔基数次回国又数次返回索伦托。这几次短暂的回国,每一次都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高尔基带着渴望而高兴的心情,参观了一个个工厂、团体、学校。他曾经三度去苏联各地旅游。1929年发表的特写《苏联游记》就是这些参观访问和旅游的成果。他还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组织出版了杂志《我们的成就》、《文学学习》、《在国外》和《国内战争史》。

事实上,高尔基已经成为了苏联作家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2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高尔基被选为作协组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他经常举行文学家的座谈会。这一时期,他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热烈探讨了创作方法问题。他认为为适应蓬勃向上的时代的要求,应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创作。1932年,斯大林提出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命名这种新的创作方法。此后,高尔基从理论上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包括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短视和远见》、《和青年作家谈话》等文章里。这些论述,对苏联70年的文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段时期,高尔基与斯蒂芬·茨威格的友谊在文坛上被传为佳话。

1928年,这位奥地利作家去访问苏联,第一

次会见了高尔基。1930年1月，当高尔基因为肺病加重返回索伦托之后，茨威格再度专程拜访了他。茨威格在他于1928年写的《向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致敬辞》和许许多多关于高尔基的文艺评论文章中最明显不过地流露了对高尔基的敬慕之情。茨威格甚至还把自己写的妙趣横生、见解独特的文学评传《三大师》（包括卡杜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献给了高尔基。茨威格多次把高尔基称为“伟大的老师”。

斯蒂芬·茨威格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高尔基都喜欢。他认为茨威格“优秀、谦虚、很有才气”。他对茨威格写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十分赞赏。他曾说：“茨威格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非常天才的思想家。我觉得，在他之前谁也不曾带着这种义士般尊敬的心情和对妇女的真挚的柔情来描写妇女。而且没有丝毫多愁善感，一切都如此朴实，如此明智……”

茨威格作为客人，在索伦托高尔基的家中度过了难忘的三天。在归途中，他给高尔基打了封电报，感谢高尔基的盛情款待。

在这段时间里，高尔基与另一位著名作家的友谊也开始达到高潮。这位作家就是法国的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虽然只比高尔基年长两岁，但两人的身世和经历都极为不同。

早在1916年前后，高尔基就仔细地阅读了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所有的文章。正是这些文章，使高尔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也使他记住了罗曼·罗兰。正当这时，高尔基打算请国内外著名的当代作家为13到18岁的青少年写一套名人传记，由他主持的《帆》出版社出版。他的计划是：

《哥伦布传》由挪威航海家南森执笔，英国作家威尔斯写《爱迪生传》、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生物学家季米里亚采夫写《达尔文传》，高尔基自己写《加里巴的传》。于是，高尔基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亲爱的罗曼·罗兰，我热切地请求您写一部贝多芬的传记，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比您写得更好！”

这是高尔基与罗曼·罗兰长达20年之久的友谊的起点。友谊建立的基点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他们俩的一生，都在思考人和人类的幸福，都在向往光明，并且以文学为工具，做出了现实而伟大的贡献。他们都真心实意地拥护无产阶级革命，都热爱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这些共同的理想，使罗曼·罗兰认识到高尔基是自己“在精神上不可多得的同志”，也使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惊奇地说：“在今天的欧洲，我不认识有谁像你那样，满腔热血和激情，而且极少教条地考虑人和人类的未来。”

他们互致对方的寿辰。高尔基50岁时，罗曼·罗兰在信中写道：“您诞生于冬尽春来，春分即将来临之际，这种巧合就象征了您的一生，它是和旧世界灭亡，新世界在狂风暴雨中的诞生紧紧相连的。”

1926年罗曼·罗兰60岁寿辰时，高尔基发表祝词，称罗兰是“一位绝无仅有的斗争者，他固执地、不倦地致力于帮助在目前阴暗岁月里，不懈地创造文化价值的人们。”在这之前，1925年，高尔基把《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献给了罗曼·罗兰。5月时，高尔基充满敬意地写道：“请允许我把这部小说献给您——献给我所热爱和尊敬的人。”罗兰则回信谈：“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像您对我表示的友谊那样，使我感到如此自豪，感到这般幸福，衷心地感谢您！”

当罗曼·罗兰70岁寿辰时，高尔基再次致贺信说：“当解放了的人类回顾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了解它令人惊叹的悲剧性史诗的日子，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劳动将会得到应有的评价。在这部史诗的画卷上，将屹立着宏伟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许多崇高艺术作品的作者的强大而又光辉的身影。您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印度、摩洛哥和美洲都受到爱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人们对您爱得尤为热烈。”他们一直渴望着相互见面与倾心交谈。

直到1935年6月，罗曼·罗兰第一次返苏时，才在莫斯科第一次与高尔基见面。他们相处了一个月。两位作家一起会见了许多苏联作家、批评家、作曲家、画家，一时成为文坛盛事。罗兰唯一遗憾的事是自己不懂俄语，而高尔基也不懂法语。年近古稀的老人罗兰竟兴致勃勃地要学俄语，争取下一次和高尔基见面时用俄语对话。但是，他们这一别就再也没有了相见的机会。

高尔基逝世以后，罗兰在日记中说：“不，我过去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对高尔基的感情有这么深厚！朋友一旦消失，友情的深度反而被我发觉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友爱，悲剧地显露出来了。我怀着极大的痛苦感觉到，和他分别以来，我是天天在盼望着同他再一次会面，我敢说，高尔基也一样，他也在盼望和我再见。1935年7月底，我们在莫斯科车站分手的时候，是我们两人之间真正的亲密友情交流的起点。”

高尔基高尚的精神追求和磊落的人格，朴实的性格，杰出的艺术造诣，使得他一生当中与许许多多文学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有如一块磁石，在他周围永远团结着无数文学界的同志。

十四、在最后的日子里

1933年5月，高尔基第5次从索伦托回到了苏联。从这时起，一直到他逝世的最初三年里，高尔基就一直住在祖国。

高尔基已经成为了苏联人民的骄傲，他被授予了列宁勋章。世界文学研究所、莫斯科艺术剧院、列宁格勒大剧院都以高尔基命名。他的家乡下诺夫戈罗德也改为高尔基市。

这位已经60多岁的老人正打算为祖国人民更积极地贡献余热的时候，遭到了一个意外的打击——他的爱子、37岁的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突然病逝。可怜的父亲亲眼看见了儿子死前痛苦的挣扎，这令他更为痛苦。高尔基是个慈父。马克西姆小时候，高尔基从来没对他端过父亲的架子。他们的交往像朋友一样友好。

《童年》是高尔基送给15岁的马克西姆的礼物。在作品的卷首题辞上亲切地写着：给我的儿子。

马克西姆则一直因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感到骄傲。受父亲的教诲，他也成了一个正直的人。后来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20年代初，高尔基去德国养病的时候，马克西姆作为外交信使正出使德国。从那时候起，高尔基就和马克西姆夫妇住在一起。两个可爱的孙女给高尔基的晚年增添了很多的乐趣。马克西姆则成为父亲最得力的助手。他掌握了4门外语，经常为父亲作翻译，打印手稿，还经常为父亲开汽车或单独完成父亲的委托。高尔基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工作上都离不开马克西姆。命运却跟高尔基开了一个沉痛的玩笑。人们雪片般涌来的唁电安慰了这位老人。他重新振作起来，回到了繁重的工作中。

1934年8月，在高尔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这是苏联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苏联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高尔基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全苏作家协会主席。

1935年底，高尔基改写了《瓦萨·日列兹诺娃》。1910年，高尔基完成了剧本的第一稿。剧本反映的是1905年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主人公瓦萨·日列兹诺娃是一个大轮船公司精明强干的女老板。她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手段毒辣、熟谙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她的丈夫日列兹诺夫犯了强奸幼女罪，法院要提起公诉。为了避免家丑外扬和公司的破产，她强迫丈夫服毒自杀。这一

事件充分暴露了瓦萨的铁石心肠和凶狠面目。

剧本不仅揭露瓦萨毒死亲夫这样的骇人听闻的丑行，而且进一步展示了这个家庭的丑恶关系。大女儿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并不感到难过，只庆幸他“不受审判”了，二女儿也把父亲的死当作儿戏。瓦萨的哥哥唯恐外人知道妹夫死亡的真实原因，一听到女仆说瓦萨曾劝丈夫“服药面儿”，立即毒打女仆，责骂她不该“凭空捏造”，最后逼得女仆自杀。同时，他马上去吻瓦萨的手，称赞她：“瓦萨，你真是个女英雄，了不起！”

瓦萨虽然毒死了丈夫，却没有换来安宁，她最大的威胁是她的“事业”后继无人。她的儿子菲多尔同女革命家腊塞尔结了婚，不久就脱离了家庭。她的两个女儿也都不成材。因此，这个拥有万贯家财的女老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五岁的孙子、腊塞尔的儿子柯里亚身上。她希望这个幼小的孙子将来成为她的“继承人”，这就是为什么她千方百计要占有孙子，把他藏起来，不让腊塞尔接走的原因。

腊塞尔是个革命者，她深刻了解瓦萨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腐朽与罪恶，知道她的儿子在这样的家庭里会被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她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外回来，就是为了争夺这新的一代。所以，腊塞尔和瓦萨一见面就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这一冲突是全剧的中心。在

这场冲突中，腊塞尔显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瓦萨这个一向好胜的女人在她面前相形见绌。尽管瓦萨对腊塞尔又是恫吓又是威胁，但她那种声嘶力竭的叫喊只不过是垂死的挣扎。加上瓦萨的哥哥和女儿都怂恿腊塞尔把孩子偷走，这对瓦萨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可是瓦萨还不死心，她命令心腹安娜去宪兵队告密，让他们把腊塞尔抓走。然而她的阴谋没有来得及实现，无情的死亡已经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因心脏病猝然发作，突然死去。同1910年版本相比，改写本中的瓦萨的形象更加鲜明、深刻，更有说服力，而且新增加了女革命家腊塞尔的形象。这样一来，剧本的中心就不是通过一个富商家庭来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腐化和道德的沦丧，而是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不可能有继承人，未来世界的主人一定是无产阶级。

从1925年就开始动笔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也在这时渐渐接近了尾声。他把这本书献给了他的秘书玛丽亚·依格纳季叶芙娜·查克列芙斯卡娅。然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并没有最后完成。从1935年开始，高尔基的健康就越来越差，有时每天得为他准备大量的氧气袋。1936年3月，高尔基开始大量吐血，感觉很疲倦。

1936年5月，高尔基乘火车从克里米亚的泰斯里回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天气闷热异常。6月1日，

高尔基在莫斯科市郊的哥尔克村患上了重感冒，这使他的肺病和心脏病变得更加严重。

6月6日起，《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各报开始发表高尔基的病情公报。人们十分关心高尔基，慰问电和慰问信雪片似的向哥尔克飞来。为了安慰高尔基，《真理报》还专为他印了一份不刊登病情公报的报纸。气喘使老人不能躺下来，他终日坐在圈椅里，顽强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当他感到轻松一点的时候，他就同周围的人们说笑，嘲笑自己的软弱无力。有时候他还谈论文学，谈论生活。高尔基在这个时候经常怀念列宁。高尔基读的最后一本书是《拿破仑传》。它由著名历史学家塔尔列在1933年完成。在这本书的书页上，至今保留着高尔基画的记号，但他最终没能够读完这本书。

1936年6月18日上午，高尔基在哥尔克逝世，享年68岁。高尔基的遗体由哥尔克村运抵莫斯科，停放在圆柱大厦中。6月20日，莫斯科的红场披上了黑纱，高尔基追悼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会后人们将高尔基的骨灰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高尔基就这样离开了他深深爱着的人民。

十五、最后的杰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作为高尔基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经过了作者数十年的酝酿。当高尔基刚刚身处知识界圈子时，他就发现了不少自私自利者。他们为了在世界上苟活，以个人主义为武器来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惜采取各种耻辱、卑鄙的手段，包括利用革命和背叛革命来获取一己私利。有感于这一点，高尔基从很早开始就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就是凝聚了高尔基数十年的心血写成的。它对旧俄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作了典型的刻画和深刻的批判。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不仅仅是讲述一个灵魂空虚、自私自利的人的历史。它通过这个人物的活动，反映出了俄罗斯十月革命前40年里社会的发展，展示了40年纷繁复杂、风起云涌的社会面貌。因此，《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同时还是一部恢宏的社会的编年史。为完成这部史诗，高尔基在1925—1936年中始终辛勤耕耘，到临死前仍耕笔不已。

克里姆·萨姆金是个非常渺小的个人主义者。他出身于一个民粹派分子的家庭。父亲从小就教育他“

不负什么责任”和做事要“标新立异”。这使萨姆金过份估计了个人对历史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萨姆金没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起初他相信民粹派，后来看见革命发展的势头，就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假面具。1905年，革命形势高涨起来了，萨姆金就成了社会民主党人。他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有了交往，甚至他还被捕过。但他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革命，他时刻准备着出卖革命。

萨姆金为了逃避革命，在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时逃往外省。1905年革命失败后，萨姆金徘徊在继续伪装还是叛变革命的选择当中。到了1907年，萨姆金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他敌视革命，也仇视列宁。小说的结尾，是萨姆金被游行的群众踩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萨姆金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他的智力和毅力都不够用，既当不了作家，又当不成政党领袖，也干不上临时政府的部长。但他十分自负，狂热地想在社会上取得有权有势的地位，凌驾于众人之上。他胆小如鼠，决不同对手进行任何正面冲突，并且最贪图享乐，追求个人舒适和精神安逸。他在政治上本来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标榜超党派立场。但他的思想的核心是极端个人主义，他为了保护自己，见机而动，玩弄两面取

巧的把戏。这是他对革命运动起先持旁观态度、继而为革命潮流所裹挟、最后脱掉伪装、暴露出反对革命的真面目的原因。无论是投机革命、革命、仇恨革命，都基于这同一个思想。

高尔基塑造这一形象的方法是把放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背景中去。这些人物分别是不同的政治、哲学和美学思想的代表。他们或者是追随萨姆金，成为他的影子；或者是为萨姆金所推崇——因为这个人可能代表了萨姆金自己个性中突出的某一个方面。如尼科诺娃、德洛诺夫等人。他们和萨姆金的思想亲缘助长了萨姆金思想的倾向，最终形成“萨姆金精神”，这一精神的实质是小市民习气和个人主义，以及对颠覆了他们腐烂而平静生活的革命的疯狂恐惧。

在展示、挖掘“萨姆金精神”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历史事件是通过萨姆金的观感反映出来的。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民粹派的破产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政治上的敌人的斗争、1896年的全俄工业展览会、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大典、20世纪初期的农民动乱、1905年1月9日事件和莫斯科十二月起义、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大战、二月革命等等。《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里庞大的历史事件的容量，使它当之无愧成为一幅俄国40年波澜壮阔的社会的全景图。

这些历史纪事并不是罗列式的，不是干巴巴地被高尔基记录下来的。它们充满了艺术色彩。高尔基巧妙地让萨姆金成为这些历史事件的目击者，通过他独特的感受，让这些历史事件鲜明地、艺术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看起来，各种事件的声势越来越大并且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迅猛地飞奔。他能记得的只是一些响亮的、像是闪光的连在一起的字眼，只是一些报纸标题那样简短的句子。报纸在大声疾呼，一些讽刺性杂志粗野地发出嘘声，卖报人在叫喊，人们都在叫喊，每天都有新的题目：“水兵起义！”——一个声音这么喊，跟着又有一个声音隆重地宣称：‘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萨姆金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好好想一想，又听到：‘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暂停。宣布举行罢工，抗议杀害喀朗施塔得水兵；黑海舰队起义。’每天都有人在讲，农民捣毁地主的庄园，有的感到恐慌，有的感到高兴。夜里萨姆金经常看到冬日茫茫的大地上，到处是焚烧房屋的大火，照耀着大地如同白昼；一根根火柱像从大地深处升起，四面八方，在白得耀眼的土地上，农民起义的浪潮，恰像是一座座爆发的火山，发出天崩地裂的巨响，喷吐着黑色的岩浆。”

高尔基这样把历史大事以一种新奇的视角，有条

不紊地记录下来。这显示了他成熟的构思和独到的笔力。高尔基还在小说中塑造了另一个人物：库图佐夫。这是一个与萨姆金完全对立的艺术形象。库图佐夫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待人真挚，有着朴素的外表和举动。他大公无私，还具有勇敢的献身精神。无论是在地下工作时，还是在敌人的监狱里，他都没有停止过斗争。

萨姆金的世界观和库图佐夫的世界观之间的矛盾斗争构成了小说的基本主题。故事情节的发展，显示了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必然灭亡和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必然胜利，也显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形象地、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典型——萨姆金，他那可笑的外表和丑陋的思想使他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通过这个形象的刻画，高尔基同时艺术性、哲学性地概括描绘了40年的历史内容。高尔基成功地同时担任了一个文学家和 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最后的杰作。

时光荏苒，马克西姆·高尔基逝世至今已有60年的时光了。每当我们重温他的一切——他的为人和

为文的时候，我们仍然为之深深感动。

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活的磨难之后，对命运仍然没有妥协，对人生依旧没有悲观。他始终以积极、乐观、自信的精神对待生活，他始终认认真真、严严肃肃地做人。他甚至乐观得把这种磨难看成是无上的馈赠。他曾自豪地说：“生活环境越艰苦，我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也越聪明。”

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极其重视精神生活。年少时，他把书籍看作是自己进步的阶梯，不惜忍受种种折磨，与书籍为友。一生中，他都把真理看成高于生命的东西，执着地进行追求。他在遭受了无数次的监禁和流放之后，仍然毫不畏缩。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自己选定的事业——无产阶级革命。他跟那些精神高尚、思想杰出的人们——列宁、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等走得那么近，友情那么深厚，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因为精神高尚、思想杰出从而具有召唤力的人，而且他在这一方面的追求永无止境。

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表现出惊人的才干与毅力。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夜，他的名字是革命暴风雨的旗帜，他在列宁的领导下创办了第一份公开发行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参与发动莫斯科十二月起义，在国外进行宣传，揭露进攻祖国的反革命势力。在反动年代，他紧密配合列宁进行工作，给布尔什维克的刊物

热情地写文章、予以支持。在一般性的刊物上，他从不停息地发表战斗性的文章，提倡民主主义的文学，反对颓废、忧伤、卑躬屈膝、色情、放荡和宗教的伪善说教。

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他心胸开阔，决不讳疾忌医；他品格高尚、性格坚强；他待人谦逊、善于学习。

他还是慈爱的父亲、忠诚的战友和严格的老师。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我们向他学习了“应该如何生活”和“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杰出的人。

作为一个作家，他表达人民思想和愿望，诚实而卓越地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他使人民了解了自己，也使世界了解了俄罗斯人民。

他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暴露社会和统治者的黑暗，同时讴歌光明和斗争。

他有杰出的里程碑式的成就。他第一个在创作中真实地反映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人类历史的新时期，第一个把新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带进文学作品中。他是无产阶级文学最伟大的代表，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他的艺术才能是惊人的。他有惊人的观察力，善于真实地表现环境的恶劣，刻画典型形象。他从民间

文学当中汲取营养，积极探索新的创作方法，并极为重视文艺的功能。他一生勤奋写作，为人们留下了一部又一部杰作。他同时是小说家、戏剧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他还培育了许多青年作家、积极从事文学组织活动。他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

高尔基的辉煌的历史功绩在于：在工人与资本主义进行决战的时代，他写出大量的艺术作品，启发广大读者群众的革命觉悟。用自己的艺术作品、政论，以及直接参加组织领导，参加革命工作，不断提高群众为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的战斗意识。毫无疑问，高尔基在他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人和伟大的作家。在今天，他的人格力量和杰出作品，一样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人。